

南腔北調集

魯色

K2914-U828.32

~~817~~
~~273.921~~

f.

82

~~817~~

~~273.921~~

1210.4 / 164.1

82



魯迅三十一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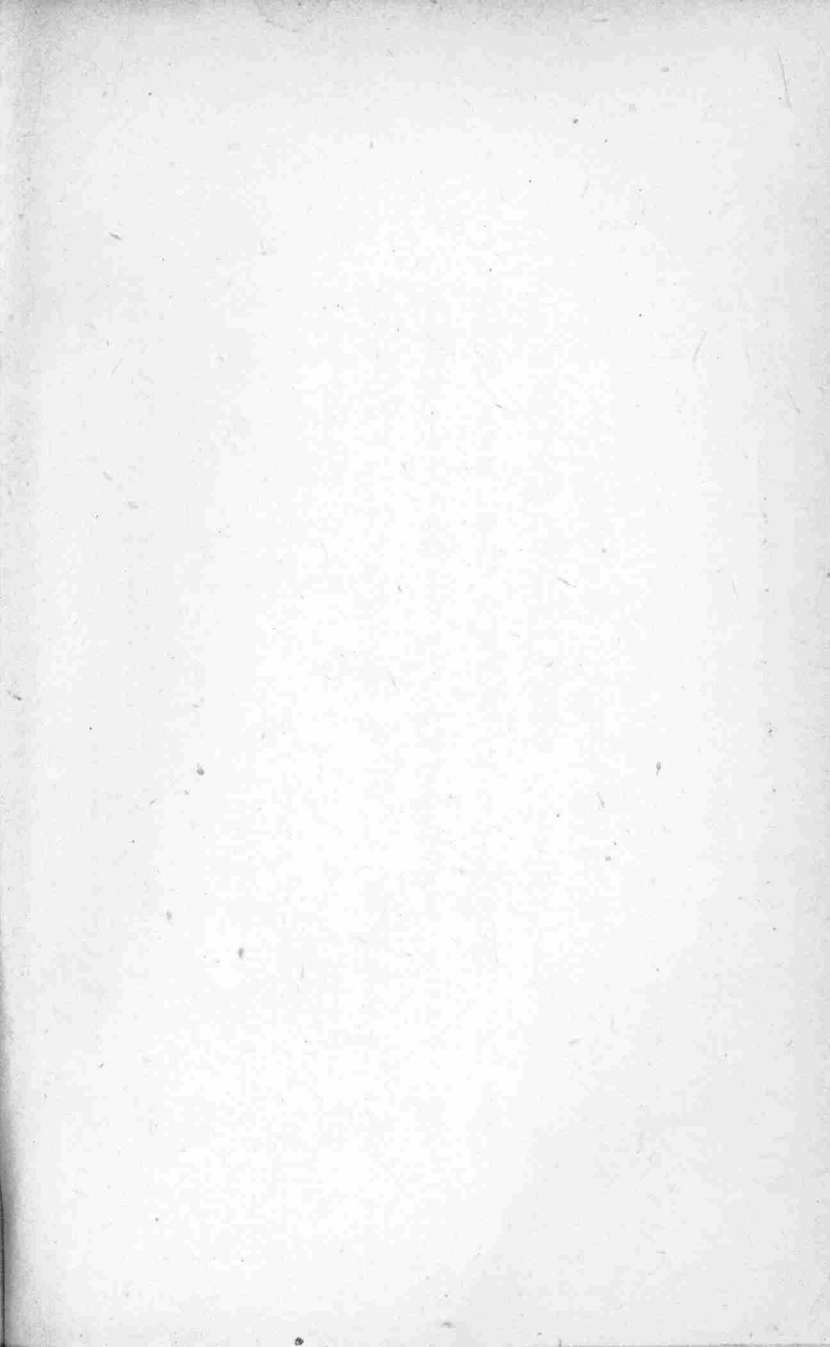
23

南腔北調集

一九三三年著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目次

題記……………九

——一九三二年——

『非所計也』……………一四

林寬多『蘇聯聞見錄』序……………一六

我們不再受騙了……………二一

『豎琴』前記（文略，見第十九卷本書。）

論『第三種人』……………二五

『連環圖畫』辯護……………三一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三七

『自選集』自序	四一
『兩地書』序言（文略，見第七卷本書。）	
祝中俄文字之交	四五

——一九三三年——

聽說夢	五二
-----	----

論『赴難』和『逃難』	五七
------------	----

學生和玉佛	六三
-------	----

爲了忘卻的記念	六四
---------	----

誰的矛盾	七六
------	----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八一
-------------	----

『蕭伯納在上海』序	八七
-----------	----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九二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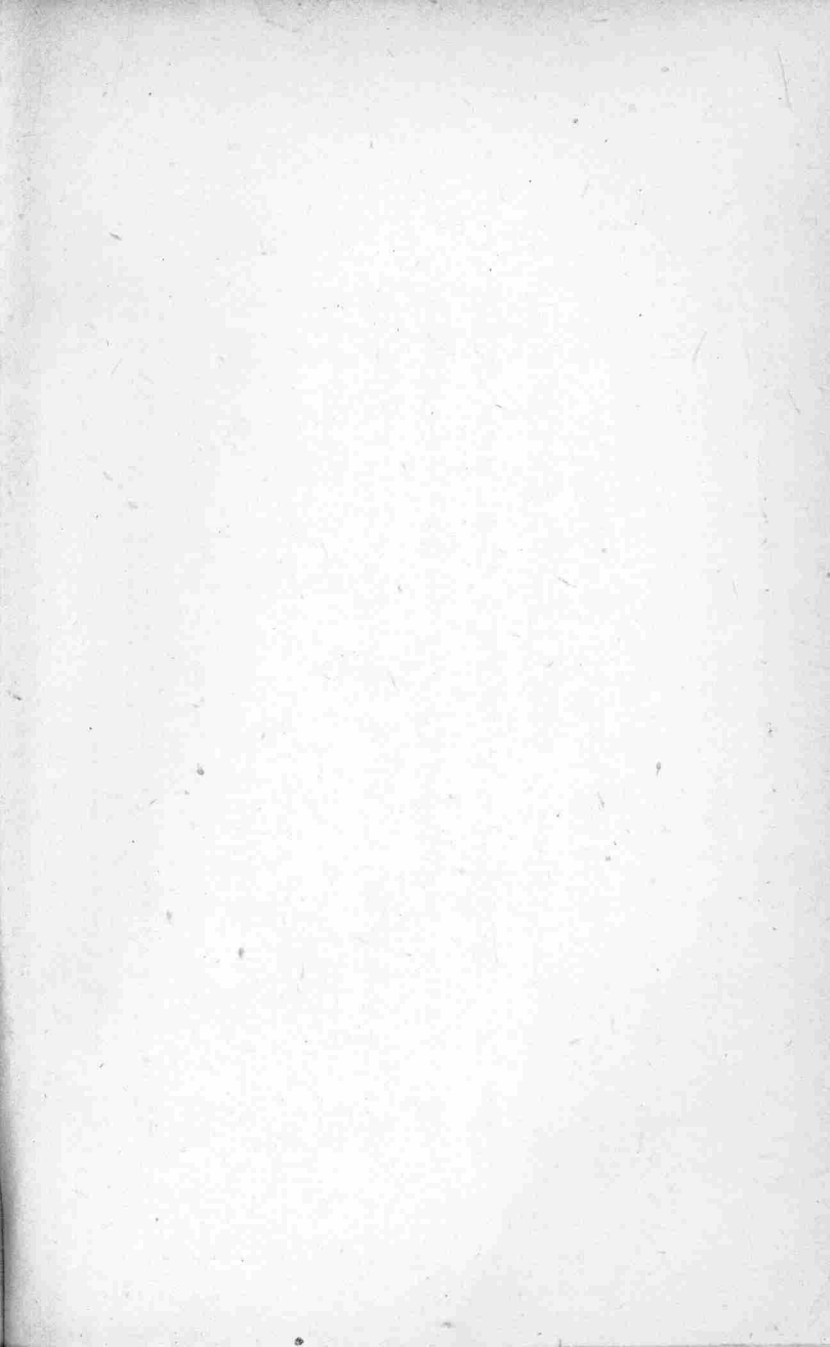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九六
----------	----

關於女人·····	一〇三
真假堂吉訶德·····	一〇六
『守常全集』題記·····	一〇九
談金聖歎·····	一一三
又論『第三種人』·····	一二六
『蜜蜂』與『蜜』·····	一三三
經驗·····	一三五
諺語·····	一三八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一三一
抄·····	一三四
給『文學社』信·····	一三七
關於翻譯·····	一三九
『一個人的受難』序·····	一四二
祝『濤聲』·····	一四六
上海的少女·····	一四九

上海的兒童	一五二
『論語一年』	一五五
小品文的危機	一六一
九一八	一六六
偶成	一七二
漫興	一七五
世故三昧	一七九
謠言世家	一八三
關於婦女解放	一八六
火	一八九
論翻印木刻	一九二
『木刻創作法』序	一九七
作文秘訣	二〇〇
搗鬼心傳	二〇五
家庭爲中國之基本	二〇八

「總退卻」序……………三〇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三三



題 記

一兩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學家，現在是好像不在這里了，那時候，卻常常拉別人爲材料，來寫她的所謂『素描』。我也沒有被赦免。據說，我極喜歡演說，但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語，則是南腔北調。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而且近幾年來，這點還

有開拓到文字上去的趨勢；語絲早經停刊，沒有了任意說話的地方，打雜的筆墨，是也得給各個編輯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可說之處說一點，不能說之處便罷休。即使在電影上，不也有時看得見黑奴怒形于色的時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裏拿着皮鞭的走過來，便趕緊低下頭去麼？我也毫不強橫。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鄰近有幾家放鞭爆，原來一過夜，就要『天增歲月人增壽』了。靜着沒事，有意無意的翻出這兩年所作的雜文稿子來，排了一下，看看已經足夠印成一本，同時記得了那上面所說的『素描』裏的話，便名之曰『南腔北調集』。準備和還未成書的將來的『五講三噓集』配對。我在私塾裏讀書時，對過對，這積習至今沒有洗乾淨，題目上有時就玩些什麼『偶成』、『漫興』、『作文祕訣』、『搗鬼心傳』。這回卻鬧到書名上來了。這是不足為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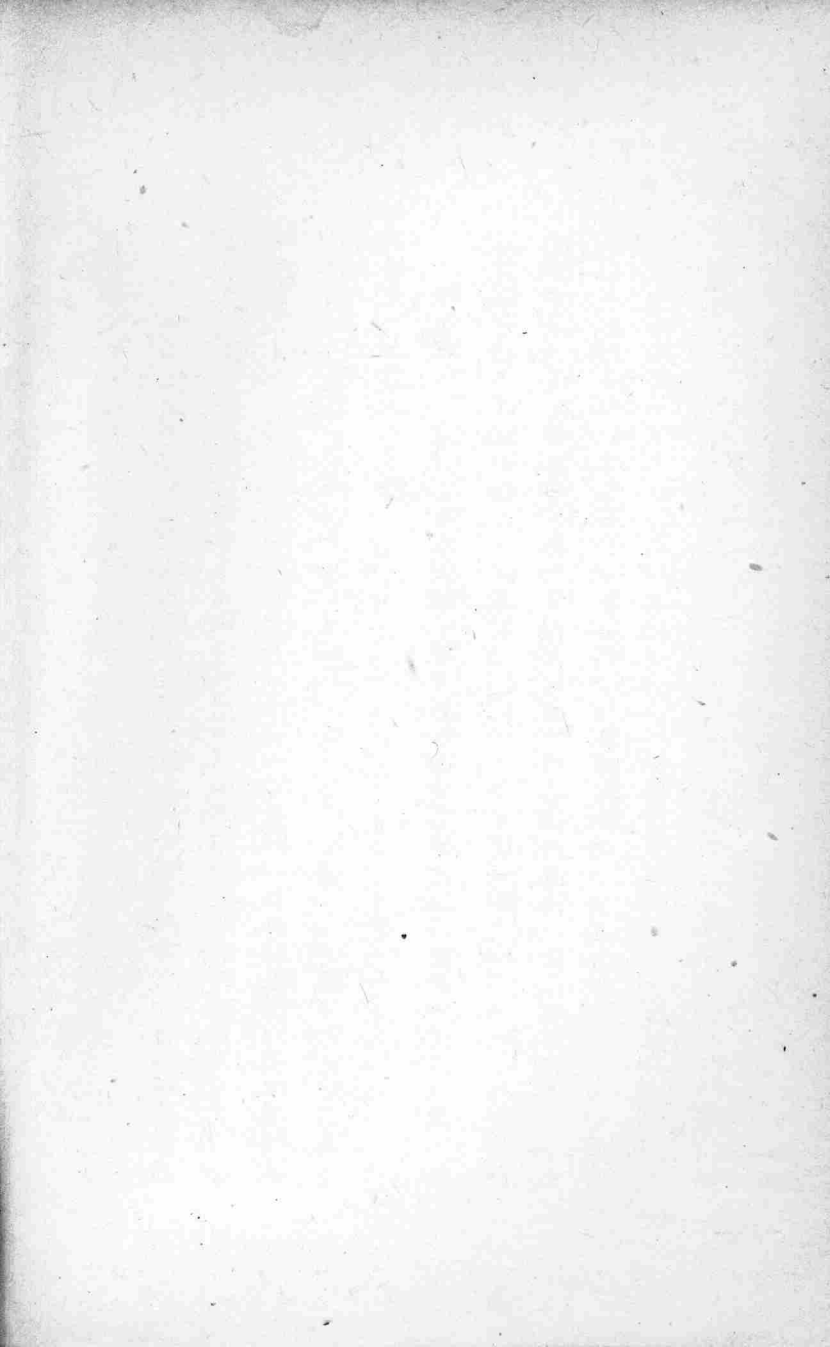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過一本偽自由書，如果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了一本了。是自己覺得笑了一笑。這笑，是有些惡意的，因為我這時想到了梁實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一位嘍囉兒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國的門肯 (H. T. Mencken) 相像，因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會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麼，喫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國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極不願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據說小人的造謠；不過門肯卻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擬，雖出自徒孫之口，骨子裏卻還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頭一撥，君子就翻一個

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還有手腕和眼睛。

不過這是小事情。舉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寫的『非所計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惡夢，胡裏胡塗，不久就整兩年。怪事隨時襲來，我們也隨時忘卻，倘不重溫這些雜感，連我自己做過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確也可以使學者們搖頭的，然而只有這一本，雖然淺薄，卻還藉此存留一點遺聞逸事，以中國之大，世變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罷。

兩年來所作的雜文，除登在自由談上者外，幾乎都在這裏面；書的序跋，卻只選了自以為還有幾句可取的幾篇。曾經登載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等，當時是大抵用了別的筆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齋記。



二九三二年

『非所計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與芳澤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口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麼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裏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電』告訴了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遼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前

日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國聯』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

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愛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據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一月八日。)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大約總歸是十年以前罷，我因爲生了病，到一個外國醫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裏放着的一本德國星期報（Die Woche）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着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着手鎗。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有這樣凶暴麼，覺得好笑罷了。後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是怎樣壞，這纔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斷定：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麼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爲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但後來又看見一幅諷刺畫，是英文的，畫着用紙版剪成的工廠、學校、育兒院等等，豎

在道路的兩邊，使參觀者坐着摩托車，從中間駛過。這是針對着做旅行記述說蘇聯的好處的作者們而發的，猶言參觀的時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不過我們中國人實在有一點小毛病，就是不大愛聽別國的好處，尤其是清黨之後，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蘇聯。一提到罷，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盧布。而且宣傳這兩個字，在中國實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樣子了，人們看慣了什麼闊人的通電，什麼會議的宣言，什麼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後，立刻無影無蹤，還不如一個屁的臭得長久，於是漸以為凡有講述遠處或將來的優點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個爲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號。

自然，在目前的中國，這一類的東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處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卻不多，因爲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後來有事實來證明的，這纔

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國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後來只有證明這『宣傳』確鑿就是說謊的事實而已，還有一種壞結果，是令人對於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臨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這影響，報章上說的什麼新舊三都的偉觀，南北兩京的新氣，固然只要看見標題就覺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國的游記，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動牠。

但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一就是這蘇聯新聞見錄。因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下去很費力，但爲了想看看這自說『爲了喫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雖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並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彷彿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鋪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過像了人樣，並沒有什麼希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豔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卻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像了人樣，于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廣東的裸體遊行，後來南京、上海又盛傳漢口的裸體遊行，就是但願敵方的不平常的證據。據這書裏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爲什麼呢？因爲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這種極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纔幹得出來的。該殺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蘇聯，已在十月革命後十年，所以只將他們之『能堅苦耐勞，勇敢與犧牲』告訴我們，而怎樣苦鬥，纔能够得到現在的結果，那些故事，卻講得很少。這自然是別種著作的任務，不能責成作者全都負擔起來，但讀者是萬不可忽略這一點的，否則就如印度的譬喻經所說，要造高樓，而反對在地上立柱，據說是因爲他要造的，是離地的高樓。

一樣。

我不加戒備的將這讀完了，即因爲上文所說的原因。而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一部書，正也轉過來是我的意見的實證。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魯迅于上海開北寓樓記。

我們不再受騙了

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牠們愈急于要進攻，因為牠們愈要趨于滅亡。

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十月革命之後，牠們總是說蘇聯怎麼窮下去，怎麼兇惡，怎麼破壞文化。但現在的事實怎樣？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喫驚了麼？正面之敵的實業黨的首領，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監禁麼？列寧格勒、莫斯科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是都沒有被炸掉麼？文學家如綏拉菲摩維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綏甫林娜、唆羅訶夫等，不是西歐、東亞，無不贊美他們的作品麼？關於藝術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據烏曼斯基（K. Umansky）說，一九一九年中，在莫斯科的展覽會就有二十次，列

寧格勃兩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則現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

然而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了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

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復興的希望，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于從前，彷彿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但我們也聽到別國的失業者，排着長串向飢寒進行；中國的人民，在內戰，在外侮，在水災，在榨取的大羅網之下，排着長串而進向死亡去。

然而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還來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好像牠倒願意蘇聯一下子就變成天堂，人們個個享福。現在竟這樣子，牠失望了，不舒服了——這真是惡鬼的眼淚。

一睜開眼，就露出惡鬼的本相來的，——牠要去懲辦了。

牠一面去懲辦，一面來誑騙。正義、人道、公理之類的話，又要滿天飛舞了。但我們記得，

歐洲大戰時候，飛舞過一回的，騙得我們的許多苦工，到前線去替牠們死，接着是在北京中央公園裏豎了一塊無恥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戰勝』的牌坊（但後來又改掉了）。現在怎樣？『公理』在那里？這事還不過十六年，我們記得的。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癩疽，是牠們的寶貝，那麼，牠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牠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爲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于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牠纔睡得着。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麼？

『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一位有名的記者曾經這樣警告我。是的，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爲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麼？只要你不^會去謀害牠，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不消說，排長串是一時難免的，但到底會快起來。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着牠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牠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牠說着怎

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纔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論『第三種人』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沈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爲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爲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我在這里先應該聲明：我爲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先生的『作家之羣』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

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于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

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爲『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爲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于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爲『資產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我以爲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卻據說是爲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爲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的擁抱力，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爲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亂的時代而要離開戰亂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爲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裏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爲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

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爲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爲幻影不能成爲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牠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左翼也要託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爲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託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爲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于現在有意義，終于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託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爲『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于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于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爲可以產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裏是可以產生託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

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的連環圖畫麼？而且是爲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纔會有工作的勇氣！』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爲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

『怎麼辦呢？』

(十月十日。)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裏了。

自然，這話裏，是埋伏着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卻的確另外聽過採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牠能够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

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涼』，便以為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宮——我沒有游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卻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強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蹟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跡，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Custave Doré），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

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則翻印本就在文明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版畫復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幾幅畫彙成一帖的『連作』（Blattfolge）。這些連作，也有並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幾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為霍普德

曼的織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種，有題目，無說明——

一『農民鬪爭』(Bauernkrieg)，金屬版七幅；

二『戰爭』(Der Krieg)，木刻七幅；

三『無產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畫，爲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Carl Meffert)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爲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Die Jagd nach Zaren von Vera Figner)刻過五幅木版圖，又有兩種連作——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

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爲非戰而逃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 München)，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幾種——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禱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沒字的故事』(Geschichte one 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陽』(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erk)木刻，幅數失記

六『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紐約的約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W. Gropper)所畫的書，據趙景深教授說，是『馬戲的故事』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 (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國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為那作品定價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Robert Gibbings)，限印五百部，英國紳

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爲藝術，並且已經坐在『藝術之宮』的裏面了。至于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能消說得的。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于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國舊書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我敢相信：對於這，大眾是要看的，大眾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

起應兄：

前天收到文學月報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覺得不足的，並非因為牠不及別種雜誌的五花八門，乃是總還不能比先前充實。但這回提出了幾位新的作家來，是極好的，作品的好壞我且不論，最近幾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經排印過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載的趨勢，這麼下去，新的作者要沒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現在打破了這局面，雖然不過是一種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掃去一些沈悶，所以我以為是一種好事情。但是我對於芸生先生的一篇詩，卻非常失望。

這詩，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別德納衣的諷刺詩而作的。然而我們來比一比罷，別德納衣的詩雖然自認爲『惡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過是笑罵。這詩怎麼樣？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罷，開首就是對於姓的開玩笑。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譬如『鐵血』、『病鴉』之類，固不妨由此開一點小玩笑。但姓氏籍貫，卻不能決定本人的功罪，因爲這是從上代傳下來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說這話還在四年之前，當時曾有人評我爲『封建餘孽』，其實是捧住了這樣的題材，欣欣然自以爲得計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過這種風氣，近幾年頗少見了，不料現在竟又復活起來，這確不能不說是一個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結末的辱罵。現在有些作品，往往並非必要而偏在對話裏寫上許多罵語去，好像以爲非此便不是無產者作品，罵詈愈多，就愈是無產者作品似的。其實好的工農之中，並不隨口罵人的多得很，作者不應該將上海流氓的行爲，塗在他們身上的。即使有喜歡罵人的無產者，也只是一種壞脾氣，作者應該由文藝加以糾正，萬不可再來展

開，使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鬧得不可開交。況且既是筆戰，就如別的兵戰或拳鬪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制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于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Q』式的戰法了。

接着又是什麼『剖西瓜』之類的恐嚇，這也是極不對的，我想。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爲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爲要殺人，即使是正面的敵人，倘不死于戰場，就有大衆的裁判，決不是一個詩人所能提筆判定生死的。現在雖然很有什麼『殺人放火』的傳聞，但這只是一種誣陷。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出實話，然而只要一看別國的例子，就可以恍然：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成功），並沒有亂殺人；俄國不是連皇帝的宮殿都沒有燒掉麼？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

自然，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

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牠，是會和他們成爲『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並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爲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爲，觀者也不以爲污穢，這纔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剛纔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寫出寄上，也許于編輯上可供參考。總之，我是極希望此後的文學月報上不再有那樣的作品的。

專此布達，並問

好。

魯迅。

十二月十日。

『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爲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爲

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爲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爲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爲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

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爲成了游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爲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爲這麼一辦，一者能够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爲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於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爲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爲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

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並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爲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居記。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裏的所謂『勝利』，是說：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牠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的變幻，又在新小說上，看見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H. Rider Haggard）的小說了，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

纏絲和非洲野蠻之古怪。至于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裏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爲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爲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爲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託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非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着癢癢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于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佈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爲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十種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啓發，而將範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並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有的比創作爲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確，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幾乎都是重譯的。

但俄國文學只是介紹進來，傳佈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 (L. Andreev) 的作品裏遇到了恐怖，阿爾志跋綏夫 (M. Artsybashev) 的作品裏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 (V. Korlenko) 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 (Maxim Gorky) 感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幾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於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兒 (John Masfield) 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與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着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於介紹者，有的說是爲了盧布，有的說是意在投降，有的笑爲『破鑼』，有的指爲共黨，而實際上的對於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爲是祕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介紹進來，傳佈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後是不屬於希特拉的卍字旗下的，死的勝利又只好以『死』

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週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非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鎗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懷裏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鬥，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於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幾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復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並不在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裏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着，是無論『破籬』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潔癖』。然而無論他終於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爲『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着『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爲『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麼？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

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裏，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鬪，變革，戰鬪，建設，戰鬪，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爲蘇聯的朋友了。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與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

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三三年

聽說夢

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臨末有新年的夢想，問的是『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和『個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爲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所謂真話之假，不如來談談夢話之真，我高興的翻了一下，知道記者先生卻大大的失敗了。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並不如此。這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爲權力所及，卻要干涉的，決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

失敗。

但我們且不去管這改夢案子，只來看寫着的夢境罷，誠如記者所說，來答覆的幾乎全部是智識分子。首先是誰也覺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許多人夢想着將來的好社會，『各盡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軌』氣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記者並沒有說）。

但他後來就有點『癡』起來，他不知從那里拾來了一種學說，將一百多個夢分爲兩大類，說那些夢想好社會的都是『載道』之夢，是『異端』，正宗的夢應該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東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終于贊成『點者』，就因爲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緣故也。

其實是記者的所以爲『載道』的夢，那裏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時候寫的，問題又近于『心理測驗』，遂致對答者不能不做各各適宜于目下自己的職業、地位、身分的夢來，（已被刪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樣『載道』，但爲將來的好社會『宣傳』的意思，是沒有的。所以，雖然夢『大家有飯喫』者有人，夢『無階級社會』

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鬭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面去。

然而要實現這『夢』境的人們是有的，他們不是說，而是做，夢着將來，而致力于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因為有這事實，這纔使許多智識分子不能不說好像『載道』的夢，但其實並非『載道』，乃是給『道』載了一下，倘要簡潔，應該說是『道載』的。

爲什麼會給『道載』呢？曰：爲目前和將來的喫飯問題而已。

我們還受着舊思想的束縛，一說到喫，就覺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沒有輕視對答者諸公的意思的。東方雜誌記者在『讀後感』裏，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見，以爲『正宗』的夢，是『表現各人的心底的祕密而不帶着社會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壓抑爲夢的根柢——人爲什麼被壓抑的呢？這就和社會制度，習慣之類連結了起來，單是做夢不打緊，一說，一問，一分析，可就不妥當了。記者沒有想到這一層，于是就一頭撞在資本家的硃筆上。但引『壓抑說』來釋夢，我想，大家必已經不以爲忤了罷。

不過，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幾文錢，喫得飽飽的罷，所以沒有感到喫飯之難，只注意于性慾。有許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也就轟然的拍起手來。誠然，他也告訴過我們，女兒多愛父親，兒子多愛母親，即因為異性的緣故。然而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誰都知道：是要喫東西！

食慾的根柢，實在比性慾還要深，在目下開口愛人，閉口情書，並不以為肉麻的時候，我們也大可以不必諱言要喫飯。因為是醒着做的夢，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為題目究竟是『夢想』，而且如記者先生所說，我們是『物質的需要遠過於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 *Consorts*（也引用佛洛伊特語）的監護好像解除了之際，便公開了一部分。其實也是在『夢中貼標語，喊口號』，不過不是積極的罷了，而且有些也許倒和表面的『標語』正相反。

時代是這麼變化，飯碗是這樣艱難，想想現在和將來，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說夢，同是小資產階級，（雖然也有人定我為『封建餘孽』或『土著資產階級』，但我自己姑且定為屬於這階級）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無須祕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夢爲隱士，夢爲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喫飯範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比上面說過的那些志向要大得遠，不過這里不來多說了。

(一月一日。)

論「赴難」和「逃難」

——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

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致慨于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鯁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於「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爲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那時的北京，還掛着「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

爲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然而，你瞧，來了呀。有一回，對着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鎗了，兵們最愛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髮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游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爲什麼呢？因爲這時又還掛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來了呀。現爲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爲幾個盧布送了性命；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爲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於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爲什麼呢？因爲這很容易爲『反動派』所利用的。爲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用誥諭，用刀鎗，用書報，用煨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爲止。

這纔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爲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不過，這是難的。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平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麼？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麼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鎗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並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礮口也堵不住，刀鎗也膠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麼，『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裏，以圖倖免呢？我想，還是前一着堂皇些，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不過于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只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沒有。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滿洲國』的虐政，說是不准私藏軍器，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也會家破人亡——先生，這很容易『爲反動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誰都說不出那里是安穩之處來，因爲到處繁殖了獵狗，詩曰：『趨趨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然則三十六計，固仍以『走』爲上計耳。

總之，我的意見是：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大學生逃了之後，卻應該想想此後怎樣才可以不至于單是逃，脫出詩境，踏
上實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為何如？能給在濤聲上發表，以備一說否？謹聽裁擇，並請
文安。

羅懋頓首。

一月二十八夜。

再：頃聞十來天之前，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可見不逃的還有，然而罪
口抗日，意圖反動，』又可見雖『敵人未到，』也大以『逃難』為是也。

二十九日補記。

學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報號外載二十七日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寧、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圍城白玉佛亦將南運。」

二十九日號外又載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傳教育部電平各大學，略曰：「據各報載檢關告緊之際，北平各大學中頗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確實。查大學生爲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驚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呈報，跡近寬縱，亦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並將下學期上課日期，併報爲要。」

三十日，「墮落文人」周動軒先生見之，有詩歎曰：

寂寞空城在，

倉皇古董遷，

頭兒誇大口，

面子靠中堅。

驚擾詎云安。

奔逃只自憐。

所嗟非玉佛。

不值一文錢。

爲了忘卻的記念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記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並非爲了別的，只因爲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卽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或者也許是不願，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裏，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見面，但他卻是不願見名人的人，結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作文學的工作，但他終於不能坐在亭子間裏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並沒有這麼高慢，他曾經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會面；我也沒有這麼高慢，對於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看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顏色是黑黑的，當時的談話我已經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爲什麼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麼一個怪名字，（怎麼怪法，現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麼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裏，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

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衆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並且告訴他不應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爲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後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裏。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麼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爲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裏，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

詩集，據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麼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 (B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託九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後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牠尋得了一個好着落。所以還鄭重其事，託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並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於歷來的經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迴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託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託他辦點

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彷彿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麼，當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麼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雲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麼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的豪紳的氣燄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爲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穩』而有福，纔正中鄉紳的意，對於『復』字卻未必有這麼熱心。他的家鄉，是台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樣樣的。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華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爲我們都以爲應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樸的文藝。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着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露谷虹兒畫選，是爲了掃

薄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戮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製圖，校字之類。可是往往不如意，說起來皺着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並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麼？——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後來他對於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歎息道，『真會這樣的麼……』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

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鄉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後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爲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心，大家都蒼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喫力，因而自己也喫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明白的告訴我，此後應該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麼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起來！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來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

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實也並不比我所怕見的神經過敏而自尊的文學青年高明。她的體質是弱的，也並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後，我纔知道我所認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德文，另外並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託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託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裏一塞，忽忽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第二天，他就是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裏還藏着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裏講過一個高僧，當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麼『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于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個客棧裏。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裏，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

了鏹，可見案情重是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繫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於昨日到龍華。并於昨夜上了鏹，開政治犯從未上鏹之紀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爲我代辦之。現亦好，且跟殷夫兄學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

望轉交趙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並未改變，想學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記念我，像在馬路上行走時候一般。

但他信裏有些話是錯誤的，政治犯而上錄，並非從他們開始，但他向來看得官場還太高，以爲文明至今，到他們纔開始了嚴酷。其實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且說馮女士的面目都浮腫了，可惜我沒有抄下這封信。其時傳說也更加紛繁，說他可以贖出的也有，說他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毫無確信；而用函電來探問我的消息的也多起來，連母親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發信去更正，這樣的大約有二十天。

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忽然得到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鎗斃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彈。

原來如此……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的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沈靜中擡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

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但末二句，後來不確了，我終於將這寫給了一個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我記得柔石在年底會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到上海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他悲憤的對我說，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够就走呢？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當北斗創刊時，我就想寫一點關於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夠，只得選了一幅珂勒惠支 (Käthe Kollwitz) 夫人的木刻，名曰『犧牲』，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她的兒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裏知道的柔石的記念。

同時被難的四個青年文學家之中，李偉森我沒有會見過，胡也頻在上海也只見過一次面，談了幾句天。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經和我通過信，投過稿，但現在尋起來，一無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統統燒掉了，那時我還沒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詩集卻在的，翻了一遍，也沒有什麼，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邊，有鋼筆寫的四行譯文道：

「生命誠寶貴，

愛情價更高；

若爲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又在第二葉上，寫着『徐培根』三個字，我疑心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纔坐在舊寓裏，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沈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沈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沈靜中擡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爲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爲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觀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二月七——八日。)

誰的矛盾

蕭 (George Bernard Shaw) 並不在周游世界，是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然而落了第。

他不願意受歡迎，見新聞記者，卻偏要歡迎他，訪問他，訪問之後，卻又都多少講些俏皮話。

他躲來躲去，卻偏要尋來尋去，尋到之後，大做一通文章，卻偏要說他自己善于登廣告。

他不高興說話，偏要同他去說話，他不多談，偏要拉他來多談，談得多了，報上又不敢照樣登載了，卻又怪他多說話。

他說的是真話，偏要說他是在說笑話，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說的是直話，偏要說他是諷刺，對他哈哈的笑，還要怪他自以為聰明。

他本不是諷刺家，偏要說他是諷刺家，而又看不起諷刺家，而又用了無聊的諷刺想來諷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書，偏要當他百科全書，問長問短，問天問地，聽了回答，又鳴不平，好像自己原來比他還明白。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逼他講道理，講了幾句，聽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會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見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為他不是實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實行者，就會和牛蘭一同關

在牢監裏，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願提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于是乎可惡。

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鬚髮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

然而他走了，這一位被人們公認為『矛盾』的蕭。

然而我想，還是熬一下子，姑且將這樣的蕭，當作現在的世界的文豪罷，嘮嘮叨叨，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爲給大家可以嘮叨起見，也還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爲矛盾的蕭沒落時，或蕭的矛盾解決時，也便是社會的矛盾解決的時候，那可不是玩意兒也。

(二月十九夜。)

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我是喜歡蕭的。這並不是因為看了他的作品或傳記，佩服得喜歡起來，僅僅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點警句，從什麼人聽說他往往撕掉紳士們的假面，這就喜歡了他了。還有一層，是因為中國也常有模倣西洋紳士的人物的，而他們卻大抵不喜歡蕭。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現在，這蕭就要到中國來，但特地搜尋着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並沒有。

十六日的午後，內山完造君將改造社的電報給我看，說是去見一見蕭怎麼樣。我就決定說，有這樣地要我去見一見，那就見一見罷。

十七日的早晨，蕭該已在上海登陸了，但誰也不知道他躲着的處所。這樣地過了好

半天，好像到底不會看見似的。到了午後，得到蔡先生的信，說蕭現就在孫夫人的家裏喫午飯，教我趕緊去。

我就跑到孫夫人的家裏去。一走進客廳隔壁的一間小小的屋子裏，蕭就坐在圓桌的上首，和別的五個人在喫飯。因為早就在什麼地方見過照相，聽說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電光一般覺得是文豪，而其實是什麼標記也沒有。但是，雪白的鬚髮，健康的血色，和氣的面貌，我想，倘若作爲肖像畫的模範，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像是喫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簡單。白俄的新聞上，曾經猜有無數的侍者，但只有一個廚子在搬菜。

蕭喫得並不多，但也許開始的時候，已經很喫了一通了也難說。到中塗，他用起筷子來了，很不順手，總是夾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漸巧妙，終於緊緊的夾住了一塊什麼東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臉，可是誰也沒有看見這成功。

在喫飯時候的蕭，我毫不覺得他是諷刺家。談話也平平常常。例如說：朋友最好，可以久遠的往還，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選擇的，所以非離開不可之類。

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相，並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裏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

兩點光景，筆會 (Pen Club) 有歡迎。也趁了摩托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裏。走到樓上，早有爲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里了。合起圍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幾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兒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則因爲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約又以爲這是諷刺。

也還有一點梅蘭芳博士和別的名人的問答，但在這裏，略之。

此後是將贈品送給蕭的儀式。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譽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戲子的臉譜的小模型，收在一個盒子裏。還有一種，聽說是演戲用的衣裳，但因爲

是用紙包好了的，所以沒有見。蕭很高興的接受了。據張若谷君後來發表出來的文章，則蕭還問了幾句話，張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蕭不聽見云。但是，我實在也沒有聽見。

有人問他菜食主義的理由。這時很有了幾個來照照相的人，我想，我這煙捲的煙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還有面會新聞記者的約束，三點光景便又回到孫夫人的家裏來。早有四五十個人，在等候了，但放進的卻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個文士，新聞記者是中國的六人，英國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還有照相師三四個。

在後園的草地上，以蕭爲中心，記者們排成半圓陣，替代着世界的周遊，開了記者的嘴臉展覽會。蕭又遇到了各色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似乎並不想多話。但不說，記者們是決不干休的，於是終於說起來了，說得一多，這回是記者那面的筆記的分量，就漸漸的減少了下去。

我想，蕭並不是真的諷刺家，因爲他就會說得那麼多。

試驗是大約四點半鐘完結的。蕭好像已經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內山書店

裏去了。

第二天的新聞，卻比蕭的話還要出色得遠遠。在同一的時候，同一的地方，聽着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卻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釋，也會由于聽者的耳朵，而變換花樣。例如，關於中國的政府罷，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們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幾個；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的。

從這一點看起來，蕭就並不是諷刺家，而是一面鏡。

但是，在新聞上的對於蕭的評論，大體是壞的。人們是各各去聽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諷刺去的，而同時也給聽了自己所討厭的，有損的諷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諷刺來諷刺道，蕭不過是一個諷刺家而已。

在諷刺競賽這一點上，我以為還是蕭這一面偉大。

我對於蕭，什麼都沒有問；蕭對於我，也什麼都沒有問。不料木村君卻要我寫一篇蕭的印象記。別人做的印象記，我是常看的，寫得彷彿一見便窺見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實

在佩服其觀察之銳敏。至于自己，卻連相書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即使遇見了名人罷，倘要我滔滔的來說印象，可就窮矣了。

但是，因為是特地從東京到上海來要我寫的，我就只得寄一點這樣的東西，算是一個對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許霞譯自改造四月特輯，更由作者校定。）

「蕭伯納在上海」序

現在的所謂「人」，身體外面總得包上一點東西，綢緞，氈布，紗葛都可以。就是窮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條破褲子；就是被稱為野蠻人的，小肚前後也多有了一排草葉子。要是在大庭廣衆之前自己脫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這就叫作不成人樣子。

雖然不像樣，可是還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紳士淑女們一齊掩住了眼睛，然而從手指縫裏偷瞥幾眼的也有，總之是要看看別人的赤條條，卻小心着自己的整齊的衣褲。

人們的講話，也大抵包着綢緞以至草葉子的，假如將這撕去了，人們也就愛聽，也怕聽。因為愛，所以圍籬來，因為怕，就特地給牠起了一個對於自己們可以減少力量的名目，

稱說這類的話的人曰『諷刺家。』

伯納·蕭一到上海，熱鬧得比泰戈爾還利害，不必說畢力涅克 (Boris Pilniak) 和穆杭 (Paul Morand) 了，我以為原因就在此。

還有一層，是『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但這是英國的事情，古來只能『道路以目』的人們是不敢的。不過時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聽洋諷刺家來『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還有一層，我在這裡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褲。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來了。蹙腳願意他主張拿拐杖，癩子希望他贊成戴帽子，塗了脂粉的想他諷刺黃臉婆，民族主義文學者要靠他來壓服了日本的軍隊。但結果如何呢？結果只要看嘮叨的多，就知道不見得十分圓滿了。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於全都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為帝國主義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須多說的，因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係』上，這才走在

們軍隊的前面。

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這麼多，倘是別的文人，恐怕不見得會這樣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這一本書，也確是重要的文獻。在前三個部門之中，就將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的各式各樣的相貌，都在一個平面鏡裏映出來了。說蕭是凹凸鏡，我也不以為確鑿。

餘波流到北平，還給大英國的記者一個教訓：他不高興中國人歡迎他。二十日路透社說北平報章多登關於蕭的文章，是『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苦痛性。』胡適博士尤其超脫，說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尙的歡迎。

『打是不打，不但是打！』

這真是一面大鏡子，真是令人們覺得好像一面大鏡子的大鏡子，從去照或不願去照裏，都裝模作樣的顯出了藏着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雖然用筆和舌的還沒有北平的外國記者和中國學者的巧妙，但已經有不少的花樣。舊傳的臉譜本來也有限，雖有未曾收錄的，或後來發表的東西，大致恐怕總在這譜裏的了。

序『海上在納伯蕭』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燈下，魯迅。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

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於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爲什麼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爲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語氣，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

今『斥纒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纒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楊升菴先生，他甚至于替漢朝人做雜事祕辛，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于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纒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于低能之談，這里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晉、唐古墳裏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于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裏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快，『潭腿』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于爲裙子所礙，甚至于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爲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摩登女郎』之列。

于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才是『小家碧玉』一齊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于利履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卽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齊齊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鷟作的朝野僉載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絲絲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於腳，尖還不夠，並且勒令她『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于以三寸爲度。這麼一來，可以不必兼

買利履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爲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於敵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癡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于自己在皮鞋裏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復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別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牠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爲什麼大呼『中庸』呢？這正因爲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

這才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於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爲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結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以孔子交游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稅的文學家，想不至于這麼奢侈的，除了只爲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別無解法。況且『不徹薑食，』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裏，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歷國，運動王公，該可以不

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麪，尙未輸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麪爲重；國道尙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裏袋着沈重的麪食，坐在車子裏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喫『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測，卽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啓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爲各要人譏大家爲『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載新聞云：『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於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口（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當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報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

不可便推定雖爲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于『學』而以『考古』爲限的。

(三月四日夜)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裏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擡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介紹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

爲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介紹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爲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c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爲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爲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爲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

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够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 Stylist。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

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咸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

入，不靠賣文爲活的緣故，不能作爲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爲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纔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爲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關於女人

國難期間，似乎女人也特別受難些。一些正人君子責備女人愛奢侈，不肯光顧國貨。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關的，都成了罪狀。彷彿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進了修道院，國難就會得救似的。

其實那不是女人的罪狀，正是她的可憐。這社會制度把她擠成了各種各式的奴隸，還要把種種罪名加在她頭上。西漢末年，女人的『墮馬髻』、『愁眉啼妝』也說是亡國之兆。其實亡漢的何嘗是女人！不過，只要看有人出來唉聲歎氣的不滿意女人的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種社會崩潰腐化的現象，決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會，本來把

女人也當做私產，當做商品。一切國產，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級的玩具。正像現在的正人君子，他們罵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維持風化，而同時正在偷偷地欣賞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個古詩人說：『地上的天堂是在聖賢的經書上，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這句話倒是老實的供狀。

自然，各種各式的賣淫總有女人的份。然而買賣是雙方的。沒有買淫的嫖男，那里會有賣淫的娼女。所以問題還在買淫的社會根源。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動的買者存在一天，那所謂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會消滅。男人是私有主的時候，女人自身也不過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許是因此罷，她的愛惜家財的心或者比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敗家精』。何況現在買淫的機會那麼多，家庭裏的女人直覺地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危險。民國初年我就聽說，上海的時髦是從長三么二傳到姨太太之流，從姨太太之流再傳到太太、奶奶、小姐。這些『人家』多數是不自覺地在和娼妓競爭——自然，她們就要

竭力修飾自己的身體，修飾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這修飾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貴起來，不但是物質上的，而且還有精神上的。

美國一個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匪，（原文無匪字，謹遵功令改譯）我們的妻女就要使我們破產，等不及工人來沒收。』中國也許是惟恐工人『來得及』，所以高等華人的男女這樣趕緊的浪費着，享用着，暢快着，那里還管得到國貨不國貨，風化不風化。然而口頭上是必須維持風化，提倡節儉的。

（四月十一日。）

真假堂吉訶德

西洋武士道的沒落產生了堂·吉訶德那樣的蠢大。他其實是個十分老實的書獃子。看他在黑夜裏仗着寶劍和風車開仗，的確傻相可掬，覺得可笑可憐。

然而這是真正的吉訶德。中國的江湖派和流氓種子，卻會愚弄吉訶德式的老實人，而自己又假裝着堂·吉訶德的姿態。儒林外史上的幾位公子，慕遊俠劍仙之爲人，結果是被這種假吉訶德騙去了幾百兩銀子，換來了一顆血淋淋的豬頭——那豬算是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訶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訶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給別人看，想要剝削別人的愚蠢。

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未必都還這麼蠢笨，連這點兒手法也看不出來。

中國現在的假吉訶德們，何嘗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國，他們卻偏要舞弄着，每天「殺敵幾百幾千」的亂嚷，還有人「特製鋼刀九十九，去贈送前敵將士。」可是，爲着要殺豬起見，又捨不得飛機捐，於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傳，一面作爲節節退卻或者「誘敵深入」的解釋，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殺豬經費。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後有袁世凱——清末的興復海軍捐建設了頤和園。民四的「反日」愛國儲金，增加了討伐當時革命軍的軍需——不然的話，還可以說現在發現了一個新發明。

他們何嘗不知道「國貨運動」振興不了什麼民族工業，國際的財神爺扼住了中國的喉嚨，連氣也透不出，甚麼「國貨」都跳不出這些財神的手掌心。然而「國貨年」是宣布了，「國貨商場」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彷彿抗日救國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買辦多賺幾個錢。這錢還是從豬狗牛馬身上剝削來的。不聽見「增加生產力」，「勞資合作共赴國難」的呼聲麼？原本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豬狗牛馬還是要負「救國責任」！結果，豬肉供給假吉訶德喫，而豬頭還是要斫下來，掛出去，以爲「搗

亂後方」者戒。

他們何嘗不知道什麼「中國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國主義，無論唸幾千萬遍「不仁不義」，或者金光明咒，也不會觸發日本地震，使牠陸沈大海。然而他們故意高喊恢復「民族精神」，彷彿得了什麼祖傳祕訣。意思其實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頭治心，多讀修身教科書。這固有文化本來毫無疑義：是岳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喫豬肉，而又遠庖廚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麼「學術救國」，引證西哲菲希德之言等類的居心，又何嘗不是如此。

假吉訶德的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癡假呆當做真癡真呆，當真認爲可笑可憐，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藥了。

(四月十一日。)

「守常全集」題記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鬪，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櫃。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鎗擊徒手請願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羣衆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麼，到這里來幹什麼？』

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於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幾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只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知道了這消息之後，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鬍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臺。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

這回聽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極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四省的並非李大釗，卻

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麼，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爲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後來聽慣了電刑，鎗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喫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衆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于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不幸對於遺文，我卻很難講什麼話。因爲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爲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馬不必注意于造橋，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那時自以爲尙非錯誤。所以現

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疊疊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麼？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係的G書局出版。我諷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後來，聽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託C書局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後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裏存留，記此一件公案。

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談金聖歎

講起清朝的文字獄來，也有人拉上金聖歎，其實是很不合適的。他的哭廟，用近事來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據三民主義以自辯，並無不同，但不特撈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殺頭，則是因為他早被官紳們認為壞貨了的緣故。就事論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擡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

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後小半，夢想有一

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說因爲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們便愁苦着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他們雖然至今不知道『慾壑難填』的古訓，卻很明白『成則爲王，敗則爲賊』的成語，賊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一點，那就是『坐寇』。中國百姓一向自稱『蟻民』，現在爲便于譬喻起見，姑陞爲牛罷，鐵騎一過，茹毛飲血，蹄骨狼藉，尙可避免，他們自然是總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們自嚼野草，苟延殘喘，擠出乳來將這些『坐寇』喂得飽飽的，後來能够比較的不復狼吞虎嚥，則他們就以爲如天之福。所區別的只在『流』與『坐』，卻並不在『寇』與『王』。試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時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際的利害的。

宋江據有山寨，雖打家劫舍，而劫富濟貧，金聖歎卻道應該在童貫、高俅輩的爪牙之

前，一個個俯首受縛，他們想不懂。所以水滸傳縱然成了斷尾巴蜻蜓，鄉下人卻還要看『武松獨手擒方臘』這些戲。

不過這還是先前的事，現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經驗了。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汽車飛機，價值既遠過于大轎馬車，租界和外國銀行，也是海通以來新添的物事，不但剃盡毛髮，就是刮盡筋肉，也永遠填不滿的。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實既然教給了這些，僅存的路，就當然使他們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又論『第三種人』

戴望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敘述着法國 A. E. A. R.（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諦的情形，並且介紹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號的現代上。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爲德來孚斯打不平，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爭。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爲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諦的一個。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併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爲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對於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

援——並不是的。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信裏的必須指出的幾點。

那通信敘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後，說道——

『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於他的藝術的人。然而，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羣衆之間發言了。』

這就是說：『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種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種人爲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

這里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爲全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據我所知道，卻並不然。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爲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於一種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鬥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着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爲反動，且不只是『資產階級的幫閒者』了。至于『忠實於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並未視同一律。因爲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於自己的藝術』來和『爲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於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介紹的演說裏的兩段來——

「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爲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爲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着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爲什麼並怎樣會在這裏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爲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爲贊成或反抗。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爲「同路人」，但他們卻並沒有這麼積極。中國關於「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彙印了一本專書，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爲「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麼？倘其沒有，則我不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

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別了。他在參加大會，爲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爲。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於德國法西斯諦的暴行有沒有什麼表示。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內戰的。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想必還在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吧！」

這里無須解答，因爲事實具在：我們這里也曾經有一點表示，但因爲和在法國兩樣，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見什麼「把所謂「第三種人」當作唯一的敵手」的文章，不再內戰，沒有軍閥氣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國的左翼作家，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國左翼作家一樣賢明了麼？我以為並不這樣，而且也不應該這樣的。如果聲音還沒有全被削除的時候，對於「第三種人」的討論，還極有從新提起和展開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國革命作家們的隱衷，覺得在這危急時，和「第三種人」攜手，也許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爲單靠「策略」是沒有用的，有真切的見解，才有精明的行爲，只要看紀德的講演，就知道他並不超然于政治

之外，決不能貿貿然稱之爲『第三種人』加以歡迎，是不必別具隱衷的。不過在中國，所謂『第三種人』卻還複雜得很。

所謂『第三種人』原意只是說：站在甲乙對立或相關之外的人。但在實際上，是可能有的。人體有胖和瘦，在理論上，是該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種人的，然而事實上卻並沒有，一加比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藝上的『第三種人』也一樣，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罷，其實是總有些偏向的，平時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來，而一遇切要的事故，牠便會分明的顯現。如紀德，他就顯出左向來了；別的人，也能從幾句話裏，分明的顯出。所以在這混雜的一羣中，有的能和革命前進，共鳴；有的也能乘機將革命中傷，軟化，曲解。左翼理論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務的。

如果這就等于『軍閥』的內戰，那麼，左翼理論家就必須更加繼續這內戰，而將營壘分清，拔去了從背後射來的毒箭！

（六月四日。）

「蜜蜂」與「蜜」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的文章後，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聽聽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並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羣，另有緣故，並非階級鬭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于蟲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蟲有助于蟲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極簡略的生物學上也都這樣說，確是不错的。但這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爲了採粉或者救飢，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餘匹一湧而入，因爲爭，將花瓣弄傷，因爲餓，將花

心咬掉，聽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種傷害的。牠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為飢餓的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牠們是喫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蟲的，但倘將牠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會將蚜蟲喫掉；人是喫米或麥的，然而遇着饑饉，便喫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並無此弊呢？那是極容易回答的：因為少。近來以養蜂爲生財之大道，幹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價，遠遜歐美，與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故買蜂者也多于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釀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種植之業，卻並不與之俱進，遂成蜜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闢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蜜種，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

「蜜」與「蜂 蜜」

著
安。

羅
懋。

六月十一日

經驗

古人所傳授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寶貴的，因為牠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裏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够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聖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嘗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築，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麼一想，這事情

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這樣嘗一點，那樣嘗一點，喫了毒的就死，喫了不相干的就無效，有的竟喫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於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後來漸成爲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經過許多人經驗之後，倒給了後人壞影響的，如俗語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傷，一不小心，向來就很容易被人所誣陷，而還有一種壞經驗的結果的歌訣，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於是人們就只要事不干己，還是遠遠的站開乾淨。我想，人們在社會裏，當初是並不這樣彼此漠不相關的，但因豺狼當道，事實上因此出過許多犧牲，後來就自然的都走到這條道路上了。所以，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裏，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儘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

總之，經驗的所得的結果無論好壞，都要很大的犧牲，雖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驚

人的代價。例如近來有些看報的人，對於什麼宣言，通電，講演，談話之類，無論牠怎樣駢四儷六，崇論宏議，也不去注意了，甚而還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過做做喜笑的資料。這那裏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一樣重要呢，然而這一點點結果，卻是犧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許多人的生命財產換來的。生命，那當然是別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到這經驗了。所以一切經驗，是只有活人纔能有的，我的決不上別人譏刺我怕死，就去自殺或拚命的當，而必須寫出這一點來，就爲此。而且這也是小小的經驗的結果。

（六月十二日。）

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閒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爲，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孫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晉之後，簡直像一個幫閒；宋徽宗在位時，不可一世，而被擄後偏會含垢忍辱。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爲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

所以被壓制時，信奉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

得勢，足以凌人的時候，他的行爲就截然不同，變爲『各人不掃門前雪，卻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來，我們常常看見武將原是練兵打仗的，且不問他這兵是用以安內或攘外，總之他的『門前雪』是治軍，然而他偏來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辦學的，無論他成績如何，總之他的『門前雪』是學務，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紹介國醫。小百姓隨軍充伙，童子軍沿門募款。頭兒胡行于上，蟻民亂碰于下，結果是各人的門前都不成樣，各家的瓦上也一團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像竟打動了賢人們的心，我記得曾有許多人絮絮叨叨，主張禁止過，後來也確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卻又『衣服蔽體已足，何必前拖後曳，消耗布匹……顧念時艱，後患何堪設想』起來，四川的象山縣長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隊一一剪掉行人的長衣的下截。長衣原是累贅的東西，但以爲不穿長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時艱』有補，卻是一種特別的經濟學。漢書上有一句云，『口含天憲』，此之謂也。

某一種人，一定只有這某一種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階級之外。說起來，好

像又在提倡什麼犯諱的階級了，然而事實是如此的。謠諺並非全國民的意思，就爲了這緣故。古之秀才，自以爲無所不曉，于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爲真，也就漸漸的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於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爲想『維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們現在看看他們的筆記罷，他們最以爲奇的，是什麼館裏的蠟人能够和活人對面下棋。南海聖人康有爲，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國，一直得到巴爾幹，這纔悟出外國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來了，曰：因爲宮牆太矮的緣故。

（六月十三日。）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文學第一期的圖書評論所評文學書部分的清算，是很有趣味，很有意義的一篇賬。這圖書評論不但是『我們唯一的批評雜誌』也是我們的教授和學者們所組成的唯一的聯軍。然而文學部分中，關於譯注本的批評卻占了大半，這除掉那『清算』裏所指出的各種之外，實在也還有一個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學術界、文藝界作工的人員，大抵都比他的實力憑空跳高一級。

校對員一面要通曉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認識字，然而看現在的出版物，『已』與『巳』，『戮』與『戠』，『刺』與『刺』，在很多的眼睛裏是沒有區別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為他不管，就壓在校對員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爲和大家不

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認識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戰慄」爲「戰慄」，以「已竟」爲「已經」；「非常頑黠」是因妬殺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說這人已六十多歲了。至于譯注的書，那自然，不是「硬譯」，就是誤譯，爲了訓斥與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圖書評論中文學部分的書數的一半，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

這些錯誤的書的出現，當然大抵是因爲看準了社會上的需要，忽忽的來投機，但一面也實在爲了勝任的人，不肯自貶聲價，來做這用力多而獲利少的工作的緣故。否則，這些譯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學，去謹聽教授們的指示的。只因爲能够不至于誤譯的人們潔身遠去，出版界上空蕩蕩了，遂使小兵也來掛着帥印，辱沒了翻譯的天下。

但是，勝任的譯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說，他也跳了一級，做了教授，成爲學者了。「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于是只配做學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虛，託庇變了譯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個譯注者的胚子，卻踞着高座，昂然說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里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的就變了中國的訶斥八極的學者，不也是一個不可動搖的證明麼？

要澄清中國的譯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級去，雖然那時候是否真是都能勝任愉快，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

(七月七日。)

沙

近來的讀書人，常常歎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無法可想，將倒楣的責任，歸之于大家。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願之類。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來說，就是『治績』。

那麼，中國就沒有沙麼？有是有的，但並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

人們又常常說：『陞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並列的，其所以要陞官，只因爲要發財，陞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所以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並不忠于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並不愛護衙署，頭領下一個清廉的命令，小嘍囉是決不聽的，對付的方法有

『朦蔽。』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有些人譯俄皇爲『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財何從來？是從小民身上刮下來的。小民倘能團結，發財就煩難，那麼，當然應該想盡方法，使他們變成散沙纔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國就成爲『一盤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還有團結的人們在，他們『如入無人之境』的走進來了。

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變。當這時候，古人曾有兩句極切貼的比喻，叫作『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那些君子們，不是像白鶴的騰空，就如獼猴的上樹，『樹倒獼猴散』。另外還有樹，他們決不會喫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螻蟻和泥沙，要踐踏殺戮都可以，他們對沙皇尙且不敵，怎能敵得過沙皇的勝者呢？

然而當這時候，偏又有人搖筆鼓舌，向着小民提出嚴重的質問道：『國民將何以自處』呢，『問國民將何以善其後』呢？忽然記得了『國民』，別的什麼都不說，只又要他們來填虧空，不是等于向着縛了手腳的人，要求他去捕盜麼？

但這正是沙皇治績的後盾，是猿鳴鶴唳的尾聲，稱尊肥己之餘，必然到來的末

沙

一着。

(七月十二日。)

給「文學社」信

編輯先生：

文學第二號，伍實先生寫的休士在中國中，開首有這樣的一段——

「……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

是的，見蕭的不只我一個，但我見了一回蕭，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罵到現在，最近的就是這回因此就併我和梅蘭芳爲一談的名文。然而那時是招待者邀我去的。這回的招待休士，我並未接到通知，時間地址，全不知道，怎麼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許有別種的原

因，當口誅筆伐之前，似乎也須略加考察。現在並未相告，就責我不到，因這不到，就斷定我看不起黑種。作者是相信的罷，讀者不明事實，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還不相信我竟是這樣一個勢利卑劣的人！

給我以誣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並不為奇：慣了。但那是小報，是敵人，略具識見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學是掛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為什麼無端虛構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這地步呢？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臺上跳舞一下，以給觀衆開心，且催嘔吐麼？我自信還不至于是這樣的腳色，我還能夠從此跳下這可怕的戲臺。那時就無論怎樣誣辱嘲罵，彼此都沒有矛盾了。

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這無關政局，決無危險，況且我們原曾相識，見面時倒是裝作十分客氣的也說不定的。

臨末，我要求這封信就在文學三號上發表。

魯迅。

七月廿九日。

關於翻譯

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于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爲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

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痲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牠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着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下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着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着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着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在洋貨裏，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Karl Witt-

Vogel）在蕭伯納是丑角裏說過——

「至于說到蕭氏是否有意于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着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杰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的信裏，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置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牠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一個人的受難」序

「連環圖畫」這名目，現在已經有些用熟了，無須更改；但其實是應該稱爲「連續圖畫」的，因爲牠並非「如環無端」而是有起有訖的畫本。中國古來的所謂「長卷」如「長江無盡圖卷」如「歸去來辭圖卷」也就是這一類，不過聯成一幅罷了。

這種畫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績，「死書」所畫冥中的情形，已就是連環圖畫。別的民族，古今都有，無須細述了。這于觀者很有益，因爲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當時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辭，非熟習的不能領會。到十九世紀末，西歐的畫家，有許多很喜歡作這一類畫，立一個題，製成畫帖，但並不一定連貫的。用圖畫來敘事，又比較的後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麥綏萊勒。我想，這和電影有極大的因緣，因爲一面是用圖畫

來替文字的故事，同時也是用連續來代活動的電影。

麥綏萊勒 (Frans Maereel) 是反對歐戰的一人，據他自己說，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蘭兌倫的勃蘭勘培克 (Blankenberghen in Flandern)，幼小時候是很幸福的，因為玩的多，學的少。求學時代是在干德 (Gent)，在那里的藝術學院裏學了半年；後來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國去了，而最愛的是巴黎，稱之為『人生的學校』。在瑞士時，常投畫稿于日報上，摘發社會的隱病，羅曼羅蘭比之于陀密埃 (Daubier) 和戈耶 (Goya)。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書籍上的插圖，和全用圖畫來表現的故事。他是酷愛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詭，出于人情，因以收得驚異和滑稽的效果。獨有這『一個人的受難』 (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 乃是寫實之作，和別的圖畫故事都不同。

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並無一字的說明，但我們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無所有的屋子裏，一個女子懷着孕了 (一)，生產之後，即被別人所斥逐，不過我不知道斥逐她的僱主，還是她的父親 (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 (三)，終於跟了別人；先前的孩子，便進了野孩子之羣，在街頭搗亂 (四)。稍大，去學木匠，但那麼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勝任的。

(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條野狗一樣(六)。他爲飢餓所逼，就去偷麪包(七)，而立刻被維持秩序的巡警所捕獲(八)，關進監牢裏去了(九)。罰滿釋出(十)，這回卻輪到他在熱鬧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過，終日揮着鶴嘴鋤，是會覺得疲勞的(十三)，這時乘機而入的卻是惡友(十四)，他受了誘惑，去會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歸途中又悔恨起來(十七)，決計進廠做工，而且一早就看書自習(十八)；在這環境裏，這才遇到了真的相愛的同人(十九)。但勞資兩方衝突了，他登高呼號，聯合了工人和資本家戰鬪(二十)；于是奸細窺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彈壓于後(二十二)，奸細又從中離間，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難的『神之子』耶穌像前，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們的開鎗(二十五)！

耶穌說過，富翁想進天國，比駱駝走過針孔還要難。但說這話的人，自己當時卻受難(Passion)了。現在是歐美的一切富翁，幾乎都是耶穌的信奉者，而受難的就輪到了窮人。

這就是『一個人的受難』中所敘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魯迅記。

祝「濤聲」

濤聲的壽命有這麼長，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謂作家也者，還有什麼什麼會，標榜着什麼什麼文學，到去年就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辦小報，賣消息；消息那里有這麼多呢，於是造謠言。先前的所謂作家還會聯成黑幕小說，現在是聯也不會聯了，零零碎碎的塞進讀者的腦裏去，使消息和祕聞之類成爲他們的全部大學問。這功績的褒獎是稿費之外，還有消息獎，「掛羊頭賣狗肉」也成了過去的事，現在是在「賣人肉」了。

于是不「賣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們，便成爲被賣的貨色。這也是無足奇的，中國是農業國，而麥子卻要向美國定購，獨有出賣小孩，只要幾百錢一斤，則古文明國中的文

藝家，當然只好賣血，尼采說過『我愛血寫的書』呀。

然而濤聲尚存，這就是我所謂『想起來實在有點奇怪。』

這是一種幸運，也是一個缺點。看現在的景況，凡有勅准或默許其存在的，倒往往會被一部分人們搖頭。有人批評過我，說，只要看魯迅至今還活着，就足見不是一個什麼好人。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現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過誰也沒有記一篇准賬。這事實又教壞了我，因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過給他們大賣消息，大造謠言，說我的被殺，其實是爲了金錢或女人關係。所以，名列于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

濤聲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這脾氣和我很相反，並不是倖存的原因。我想，那幸運而且也是缺點之處，是在總喜歡引古證今，帶些學究氣。中國人雖然自誇『四千餘年古國古』，可是十分健忘的，連民族主義文學家，也會認成吉斯汗爲老祖宗，則不宜與之談古也可見。上海的市僧們更不需要這些，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是今天開獎，鄰右爭風，眼光遠大的也不過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闖人和誰要好之類，高尚的就看什麼學界瑣聞，文壇消息。總之，是已將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這可以使濤聲的銷路不見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濤聲長壽。文人學士是清高的，他們現在也更加聰明，不再恭維自己的主子，來着痕迹了。他們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糞帚，監督着應該俯伏着的奴隸們，看有誰擡起頭來的，就射過去，洒過去，結果也許會終于使這人被綁架或被暗殺，由此使民國的國民一律『平等』。濤聲在銷路上的不大出頭，也正給他逃了暫時的性命，不過，也還是很難說，因為『不測之戚』也是古來就有的。

我是愛看濤聲的，並且以爲這樣也就好。然而看近來，不談政治呀，仍談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來，則我的那些忠告，對於『烏鴉爲記』的刊物，恐怕也不見得有效。

那麼，『祝』也還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張，算一張了。昔人詩曰，『喪亂死多門』，
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濤聲上，果然發出休刊辭來，開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繳還登記證，「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我們準備休息一些時了。』……這真是康有爲所說似的『不幸而吾言中』，豈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

十二月三十一夜補記。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摺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裏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種必要的條件，是帶着一點風騷，能受幾句調笑。否則，也會終于引出普通的白眼來。

慣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覺着這種自己所具的光榮，同時也明白着

這種光榮中所含的危險。所以凡有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像一切異性的親人，也像一切異性的敵人，她在喜歡，也正在惱怒。這神氣也傳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們有時會看見她們在店鋪裏購買東西，側着頭，佯嗔薄怒，如臨大敵。自然，店員們是能像對於成年的女性一樣，加以調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這調笑的意義。總之：她們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們在日報上，確也常常看見誘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聞。

不但是西遊記裏的魔王，喫人的時候必須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類中的富戶豪家，也一向以童女爲侍奉，縱慾，鳴高，尋仙，採補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麩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豬芽茶一樣。現在這現象並且已經見于商人和工人裏面了，但這乃是人們的生活不能順遂的結果，應該以飢民的掘食草根樹皮爲比例，和富戶豪家的縱恣的變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國是連少女也進了險境了。

這險境，更使她們早熟起來，精神已是成人，肢體卻還是孩子。俄國的作家梭羅古勃

曾經寫過這一種類型的少女，說是還是小孩子，而眼睛卻已經長大了。然而我們中國的作家是另有一種稱讚的寫法的：所謂『嬌小玲瓏』者就是。

（八月十二日。）

上海的兒童

上海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一帶，因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熱鬧了，店鋪從法租界搬回，電影院早經開始，公園左近也常見攜手同行的愛侶，這是去年夏天所沒有的。

倘若走進住家的衙堂裏去，就看見便溺器，喫食擔，蒼蠅成羣的在飛，孩子成隊的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詈，真是一個亂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進眼簾來的卻只是軒昂活潑地走着走着的外國孩子，中國的兒童幾乎看不見了。但也並非沒有，只因爲衣褲郎當，精神萎靡，被別人壓得像影子一樣，不能醒目了。

中國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兩種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點也不管，罵人固可，

打人亦無不可，在門內或門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網的蜘蛛一般，立刻毫無能力。其二，是終日給以冷遇或訶斥，甚而至于打撲，使他畏葸退縮，彷彿一個奴才，一個傀儡，然而父母卻美其名曰『聽話』，自以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來，則如暫出樊籠的小禽，他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

現在總算中國也有印給兒童看的畫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兒童，然而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着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的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于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做效的範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畫罷，英國沈着，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

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

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八月十二日。)

「論語一年」

——借此又談蕭伯納——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纔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聖歎，「殺頭，至痛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聖歎並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爲一笑，收場

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並無什麼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動手者寥寥無幾，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種禮制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氣息。這氣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

不大熱心于『論語』了。

然而，蕭的專號是好的。

牠發表了別處不肯發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連喫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憎惡之久，憎惡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據。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聖』，我們不大人提起他。五四時代介紹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介紹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脹。

爲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嬉笑麼？並不是的。爲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別人的病痛麼？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說得很分明：就因爲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而蕭是偉大的感歎號（！）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種。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一點隱蔽，但並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有些什麼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確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着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餘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後，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麼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反對的比贊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闊衣裝，終于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只有並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麼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裏的，他卻從大茅廁裏爬出，也是一隻蛆蟲，紹介者胡塗，稱讚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隻蛆蟲，卻還是一隻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裡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

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牠也是從茅廁裏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牠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

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為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生』的實驗尚未成功，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並不十分體面。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卻並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來。

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達爾文善于研究，卻不善于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鬪爭的是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闢的文章，東衝西突，攻陷了自

以爲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的最後的堡壘。現在是指人爲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糞，有的爲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閹人開心的吧兒和在雪地裏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俏皮與正經之間』（語堂語）不知俏皮與正經之辨，怎麼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莊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與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

這如何容得感歎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准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着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祇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這可見『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於『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過敏。有版稅的尙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麼？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不是客人，主賓之間，用不着『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喫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

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都已新出，『孝經』是一定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里會辦得好；二十五本，已經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

小品文的危機

彷彿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着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迹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麼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有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也就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鏽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牠們陳列在書房

裏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爲『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牠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紮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爲安閒，在客棧裏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煙榻一張，癡足心閑，摩挲賞鑑。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麼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的丈八佛像的足下，牠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羣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着什

麼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地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着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但這時卻只用得着掙扎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牠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鏘。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着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纔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纔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着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于英國的隨筆 (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爲了對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爲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牠成爲『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爲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鴉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裏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盛行，茶話酒談，徧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街堂裏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裏蹺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

和被麻醉者同歸于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牠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牠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八月二十七日)

九一八

陰天，响午大風雨。看晚報，已有紀念這紀念日的文章，用風雨作材料了。明天的日報上，必更有千篇一律的作品。空言不如事實，且看看那些記事罷——

戴季陶講如何救國

(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國府十八日晨舉行紀念週，到林森、戴季陶、陳紹寬、朱家驊、呂超、魏懷暨國府職員等四百餘人，林主席領導行禮，繼戴講如何救國，略謂本日係九一八兩週年紀念，吾人於沈痛之餘，應想法達到救國目的，救國之道甚多，如道德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最近又有所謂航空運動及節約運動，前者之動機在於國防與交通上建設，此後吾人應從根本上設法增強國力，不應

只知向外國購買飛機，至於節約運動須一面消極的節省消費，一面積極的將金錢用於生產方面。在此國家危急之秋，吾人應該各就自己的職務上盡力量，根據總理的一貫政策，來做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

吳敬恆講紀念意義

（中央社）

南京十八日——中央十八日晨八時舉行九一八二週年紀念大會，到中委汪兆銘、陳果夫、邵元冲、陳公博、朱培德、賀耀祖、王祺等暨中央工作人員共六百餘人，汪主席由吳敬恆演講以精誠團結充實國力，為紀念九一八之意義，闡揚甚多，並指正愛國之道，詞甚警惕，至九時始散。

漢口靜默停止娛樂

（日聯社）

漢口十八日——漢口九一八紀念日華街各戶均揭半旗，省市兩黨部上午十時舉行紀念會，各戲院酒館等一律停業，上午十一時全市人民默禱五分鐘。

廣州禁止民衆遊行

（路透社）

廣州十八日——各公署與公共團體今晨均舉行九一八國恥紀念，中山紀

念堂晨間行紀念禮，演說者均抨擊日本對華之侵略，全城汽笛均大鳴，以警告民衆，且有飛機於行禮時散發傳單，惟民衆大游行，爲當局所禁，未能實現。

東京紀念祭及犬馬

(日聯社)

東京十八日——東京本日舉行九一八紀念日，下午一時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陣亡軍人遺族慰安會，築地本願寺舉行軍馬軍犬軍鴿等之慰靈祭，在鄉軍人於下午六時開大會，靖國神社舉行陣亡軍人追悼會。

但在上海怎樣呢？先看租界——

雨絲風片倍覺消沈

今日之全市，既因雨絲風片之侵襲，愁雲慘霧之籠罩，更顯黯淡之象，但駕車遍遊全市，則殊難得見九一八特殊點綴，似較諸去年今日，稍覺消沈，但此非中國民衆之已漸趨於麻木，或者爲中國民衆已覺悟於過去標語口號之不足恃，祇有埋頭苦做之一道乎？所以今日之南市閘北以及租界區域，情形異常平安，道途之間，除警務當局多派警探在衝要之區，嚴密戒備外，簡直無甚可以紀

述者。

以上是見于大美晚報的，很爲中國人祝福。至華界情狀，卻須看大晚報的記載了——

今日九一八

華界戒備

公安局據密報防反動

今日爲「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國難二週紀念，市公安局長文鴻恩，昨據密報，有反動份子，擬藉國難紀念爲由，祕密召集無知工人，乘機開會，企圖煽惑搗亂秩序等語，文局長核報後，卽訓令各區所隊，仍照去年「九一八」實施特別戒備辦法，除通告該局各科處於今晨十時許，在局長辦公廳前召集全體職員，及警察總隊第三中隊警士，舉行「九一八」國難紀念，同時併行紀念週外，並飭督察長李光曾派全體督察員，男女檢查員，分赴中華路，民國路，方浜路，南陽橋，唐家灣，斜橋等處，會同各區所警士，在各要隘街衢，及華租界接壤之處，自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中午十一時半至三時，下午三時至六時半，分三班輪

流檢查行人。南市大吉路公共體育場，滬西曹家渡三角場，閘北譚子灣等處，均派大批巡邏警士，禁止集會遊行。製造局路之西，徐家匯區域內主要街道，尤宜特別注意，如遇發生事故，不能制止者，即向麗園路報告市保安處第二團長處置，凡工廠林立處所，加派雙崗駐守，紅色車巡隊，沿城環行駛巡，形勢非常壯嚴。該局偵緝隊長盧英，飭偵緝領班陳光炎，陳才福，唐炳祥，夏品山，各率偵緝員，分頭密赴曹家渡，白利南路，膠州路及南市公共體育場等處，嚴密暗探反動份子行動，以資防範，而遏亂萌。公共租界暨法租界兩警務處，亦派中西探員出發搜查，以防反動云。

『紅色車』是囚車，中國人可坐，然而從中國人看來，卻覺得『形勢非常壯嚴』云。記得前兩天（十六日）出版的生活所載的兩年的教訓裏，有一段說——

『第二，我們明白誰是友誰是仇了。希特勒在德國民族社會黨大會中說：「德國的仇敵，不在國外，而在國內。」北平整委會主席黃郛說：「和共抗日之說，實為謬論；剿共和外方為救時救黨上策。」我們卻要說「民族的仇敵，不僅

是帝國主義，而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走狗們。」民族反帝的真正障礙在那裏，還有比這過去兩年的事實指示得更明白嗎？」

現在再來一個切實的註腳：分明的鐵證還有上海華界的『紅色車』是一天裏的
大教訓！

年年的這樣的情狀，都被時光所埋沒了，今夜作此，算是紀念文，倘中國人而終不至
被害盡殺絕，則以貽我們的後來者。

(是夜，記。)

偶成

九月二十日的申報上，有一則嘉善地方的新聞，摘錄起來，就是——

『本縣大窰鄉沈和聲與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綁架而去，勒索三萬元。沈姓家以中人之產，遷延未決。詎料該幫股匪乃將沈和聲父子及蘇境方面綁來肉票，在丁棚北，北蕩灘地方，大施酷刑。法以布條遍貼背上，另用生漆塗敷，俟其稍乾，將布之一端，連皮揭起，則痛澈心肺，哀號呼救，慘不忍聞。時爲該處居民目覩，惻然心傷，盡將慘狀報告沈姓，速卽往贖，否則恐無生還。幫匪手段之酷，洵屬駭聞。』

『酷刑』的記載，在各地方的報紙上是時時可以看到的，但我們只在看見時覺得『酷』，不久就忘記了，而實在也真是記不勝記。然而酷刑的方法，卻決不是突然就會發

明，一定都有牠的師承或祖傳，例如這石塘小弟所採用的，便是一個古法，見于士大夫未必肯看，而下等人卻大抵知道的說岳全傳一名精忠傳上，是秦檜要岳飛自認『漢奸』逼供之際所用的方法，但使用的材料，卻是麻條和魚鱗。我以為生漆之說，是未必的確的，因為這東西很不容易乾燥。

『酷刑』的發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這是他們唯一的事業，而且也有工夫來考究。這是所以威民，也所以除奸的，然而老子說得好，『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有被刑的資格的就來玩一個『剪竊』。張獻忠的剝人皮，不是一種駭聞麼？但他之前已有一位剝了『逆臣』景清的皮的永樂皇帝在。

奴隸們受慣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對人應該用酷刑。

但是，對於酷刑的效果的意見，主人和奴隸們是不一樣的。主人及其幫閒們，多是智識者，他能推測，知道酷刑施之于敵對，能夠給與怎樣的痛苦，所以他會精心結撰，進步起來。奴才們卻一定是愚人，他不能『推己及人』，更不能推想一下，就『感同身受』。只要有權，會採用成法自然也難說，然而他的主意，是沒有智識者所測度的那麼慘厲的。綏

拉菲摩維支在鐵流裏，寫農民殺掉了一個貴人的小女兒，那母親哭得很淒慘，他卻詫異道，哭什麼呢，我們死掉多少小孩子，一點也沒哭過。他不是殘酷，他一向不知道人命會這麼寶貴，他覺得奇怪了。

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們無異于豬狗。

用奴隸或半奴隸的幸福者，向來只怕『奴隸造反』，真是無怪的。

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而『酷刑』卻因此更到了末路。在現代，鎗斃是早已不足為奇了，梟首陳屍，也只能博得民衆暫時的鑒賞，而搶劫，綁架，作亂的還是不減少，並且連綁匪也對於別人用起酷刑來了。酷的教育，使人們見酷而不再覺其酷，例如無端殺死幾個民衆，先前是大家就會嚷起來的，現在卻只如見了日常茶飯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沒有感覺的癩象一樣了，但正因為成了癩皮，所以又會踏着殘酷前進，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還是毫無辦法的。

(九月二十日。)

漫與

地質學上的古生代的秋天，我們不大明白了，至於現在，卻總是相差無幾。假使前年是肅殺的秋天，今年就成了淒涼的秋天，那麼，地球的年齡，怕比天文學家所豫測的最短的數目還要短得多罷。但人事卻轉變得真快，在這轉變中的人，尤其是詩人，就感到了不同的秋，將這感覺，用悲壯的，或淒惋的句子，傳給一切平常人，使彼此可以應付過去，而天地間也常有新詩存在。

前年實在好像是一個悲壯的秋天，市民捐錢，青年拚命，笳鼓的聲音也從詩人的筆下湧出，彷彿真要『投筆從戎』似的。然而詩人的感覺是銳敏的，他未始不知道國民的赤手空拳，所以只好讚美大家的殉難，因此在悲壯裏面，便埋伏着一點空虛。我所記得的，

是邵冠華先生的醒起來罷（民國日報所載）裏的一段——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鼓聲之聲要在前線，當進軍的時候，是『作氣』的，但尙且要『再而衰，三而竭』，倘在並無進軍的準備的處所，那就完全是『散氣』的靈丹了，倒使別人的緊張的心情，由此轉成弛緩。所以我曾比之于『噫喪』，是送死的妙訣，是喪禮的收場，從此使生人又可以在別一境界中，安心樂意的活下去。歷來的文章中，化『敵』爲『皇』，稱『逆』爲『我朝』，『這樣的悲壯的文章就是其間的『蝴蝶鉸』，但自然，作手是不必同出于一人的。然

而從詩人看來，據說這些話乃是一種『狂吠』。

不過事實真也比評論更其不留情面，僅在這短短的兩年中，昔之義軍，已名『匪徒』，而有些『抗日英雄』，卻早已僑寓姑蘇了，而且連捐款也發生了問題。九一八的紀念日，則華界但有囚車隨着武裝巡捕梭巡，這囚車並非『意圖』拘禁敵人或漢奸，而是專爲『意圖乘機搗亂』的『反動分子』所豫設的寶座。天氣也真是陰慘，狂風驟雨，報上說是『颶風』，是天地在爲中國飲泣，然而在天地之間——人間，這一日卻『平安』的過去了。

于是就成了雖然有些慘淡，卻很『平安』的秋天，正是一個喪家屈了除服之期的景象。但這景象，卻又與詩人非常適合的，我在醒起來罷同胞的同一作家的秋的黃昏（九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所載）裏，聽到了幽咽而舒服的聲調——

『我到了秋天便會傷感；到了秋天的黃昏，便會流淚，我已很感覺到我的傷感，是受着秋風的波動而興奮地展開，同時自己又像會發現自己的環境是最適合於秋天，細細地撫摩着秋天在自然裏發出的音波，我知道我的命運使我

成爲秋天的人……」

釘梢，現在中國所流行的，是無賴子對於摩登女郎，和偵探對於革命青年的釘梢，而對於文人學士們，卻還很少見。假使追躡幾月或幾年試試罷，就會看見許多怎樣的情隨事遷，到底頭頭是道的詩人。

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着，並且不平着，掙扎着，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于這生活。就因爲奴羣中有這一點差別，所以使社會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別，而在文學上，就分明的顯現了麻醉的和戰鬪的的不同。

（九月二十七日。）

世故三昧

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我的經驗，得到『深于世故』的惡諛者，卻還是因為『不通世故』的緣故。現在我假設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于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

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爲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係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爲人人都脫不了這關係，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只是說着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爲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割，像明末的鄭鄮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裏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着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着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纔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裏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爲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爲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麼，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覩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於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同鄉、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籲的話之外，利害無關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爲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爲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世故』深到不自覺其『深于世故』，這纔真是『深于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於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爲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里。他是我爲狡猾的。但是，我的話裏，一面固然顯示着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着

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站出去戰鬪了。責人的『深于世故』而避開了『世』不談，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我現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噯！

(十月十三日。)

謠言世家

雙十佳節，有一位文學家大名湯增墩先生的，在時事新報上給我們講光復時候的杭州的故事。他說那時杭州殺掉許多駐防的旗人，辨別的方法，是因爲旗人叫『九』爲『鈞』的，所以要他說『九百九十九』一露馬腳，刀就砍下去了。

這固然是頗武勇，也頗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謠言。

中國人裏，杭州人是比較的文弱的人。當錢大王治世的時候，人民被刮得衣褲全無，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還要追捐，除被打得麁一般叫之外，並無貳話。不過這出于宋人的筆記，是謠言也說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帶着沒落的閩人，和暮氣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來，卻是事實，苟延殘喘，要大家有剛決的氣魄，難不難。到現在，西子湖邊還多是

搖搖擺擺的雅人連流氓也少有浙東似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軍閥做着後盾，那是也會格外的撒潑的，不過當時實在並無敢于殺人的風氣，也沒有樂于殺人的人們。我們只要看舉了老成持重的湯蟄仙先生做都督，就可以知道是不會流血的。

不過戰事是有的。革命軍圍住旗營，開鎗打進去，裏面也有時打出來。然而圍得並不緊，我有一個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卻自進旗營睡覺去了。

雖然如此，駐防軍也終于被擊潰，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卻並沒有殺戮。口糧當然取消，各人自尋生計，開初倒還好，後來就遭災。

怎麼會遭災的呢？就是發生了謠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優游于西子湖邊，秀氣所鍾，是聰明的，他們知道沒有了糧，只好做生意，于是賣糕的也有，賣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氣的，並不歧視，生意也還不壞。然而祖傳的謠言起來了，說是旗人所賣的東西，裏面都藏着毒藥。這一下子就使漢人避之惟恐不遠，但倒是怕旗人來毒自己，並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結果是他們所賣的糕餅小菜，毫

無生意，只得在路邊出賣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窮路絕，就一敗塗地了。這是杭州駐防旗人的收場。

笑裏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時候無須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來，甲午戰敗，就說是李鴻章害的，因為他兒子是日本的駙馬，罵了他小半世；庚子拳變，又說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為造藥水，就亂殺了一大通。下毒學說起于辛亥光復之際的杭州，而復活于近來排日的時候。我還記得每有一回謠言，就總有誰被誣為下毒的奸細，給誰平白打死了。

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至于用數目來辨別漢滿之法，我在杭州倒聽說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們數一二三四，數到『六』字，讀作上聲，便殺卻。但杭州離荆州太遠了，這還是一種謠言也難說。

我有時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謠言，那句是真話了。

(十月十三日。)

關於婦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女子與小人歸在一類裏，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親。後來的道學先生們，對於母親，表面上總算是敬重的了，然而雖然如此，中國的爲母的女性，還受着自己兒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輕蔑。

辛亥革命後，爲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還有，現在有些太太們，可以和闊男人並肩而立，在碼頭或會場上照一照相；或者當汽船飛機開始行動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個酒瓶（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說不定，我不知道那詳細了），也還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樣的職業，

除女工，爲的是她們工錢低，又聽話，因此爲廠主所樂用的不算外，別的就大抵只因爲是女子，所以一面雖然被稱爲『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榮的廣告。男子倘要這麼突然的飛黃騰達，單靠原來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變狗不可。

這是五四運動後，提倡了婦女解放以來的成績。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職業婦女的痛苦的呻吟，評論家的對於新式女子的譏笑。她們從閨閣走出，到了社會上，其實又是成爲給大家開玩笑，發議論的新資料了。

這是因爲她們雖然到了社會上，還是靠着別人的『養』；要別人『養』，就得聽人的嘮叨，甚至於侮辱。我們看看孔夫子的嘮叨，就知道他是爲了要『養』而『難』，『近之』『遠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緣故。這也是現在的男子漢大丈夫的一般的歎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沒有消滅『養』和『被養』的界限以前，這歎息和苦痛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這並未改革的社會裏，一切單獨的新花樣，都不過一塊招牌，實際上和先前並無兩樣。拿一匹小鳥關在籠中，或給站在竿子上，地位好像改變了，其實還只是一樣的在給別

人做玩意，一飲一啄，都聽命于別人。俗語說：『受人一飯，聽人使喚，』就是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別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別，然而地位卻應該同等。必須地位同等之後，纔會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消失了歎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戰鬪。但我並非說，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的拿鎗，或者只給自己的孩子吸一隻奶，而使男子去負擔那一半。我只以為應該不自苟安于目前暫時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濟等等而戰鬪。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單爲了現存的惟婦女所獨有的桎梏而鬪爭，也還是必要的。

我沒有研究過婦女問題，倘使必須我說幾句，就只有這一點空話。

(十月二十一日。)

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給人類，總算是犯了天條，貶入地獄。但是，鑽木取火的燧人氏卻似乎沒有犯竊盜罪，沒有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那時候，樹木還是無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也被忘卻了，到如今只見中國人供火神菩薩，不見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薩只管放火，不管點燈。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養起來，希望他少作惡。然而如果他不作惡，他還受得着供養麼，你想？

點燈太平凡了。從古至今，沒有聽到過點燈出名的名人，雖然人類從燧人氏那里學會了點火已經有五六十年的時間。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燒了書沒有燒人；項羽入關又放了一把火——燒的是阿房宮不是民房（？——待考）……羅馬的

一個什麼皇帝卻放火燒百姓了；中世紀正教的僧侶就會把異教徒當柴火燒，間或還灌上油。這些都是一世之雄。現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證人。如何能不供養起來。何況現今是進化時代，火神菩薩也代代跨竈的。

譬如說罷，沒有電燈的地方，小百姓不顧什麼國貨年，人人都要買點洋貨的煤油，晚上就點起來；那麼幽黯的黃澄澄的光線映在紙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這麼點燈！你們如果要光明的話，非得禁止這樣『浪費』煤油不可。煤油應當扛到田地裏去，灌進噴筒，呼啦呼啦的噴起來……一場大火，幾十里路的延燒過去，稻禾，樹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會兒都變成飛灰了。還不够，就有燃燒彈，硫磺彈，從飛機上面扔下來，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够燒幾天幾晚。那纔是偉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薩的威風是這樣的。可是說起來，他又不承認：火神菩薩據說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災，卻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爲非作歹，縱火搶掠。

誰知道呢？歷代放火的名人總是這樣說，卻未必總有人信。

我們只看見點燈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壯的，所以點燈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養。你不

見海京伯馬戲團摩宰了耕牛餵老虎原是這年頭的『時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論翻印木刻

麥綏萊勒的連環圖畫四種出版並不久，日報上已有了種種的批評，這是向來的美術書出版後未能遇到的盛況，可見讀書界對於這書，是十分注意的。但議論的要點，和去年已不同：去年還是連環圖畫是否可算美術的問題，現在卻已經到了看懂這些圖畫的難易了。

出版界的進行可沒有評論界的快。其實，麥綏萊勒的木刻的翻印，是還在證明連環圖畫確可以成爲藝術這一點的。現在的社會上，有種種讀者層，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種種，這四種是供給智識者層的圖畫。然而爲什麼有許多地方很難懂得呢？我以爲是由于經歷之不同。同是中國人，倘使曾經見過飛機救國或『下蛋』則在圖上看見這東西，卽刻

就懂，但若歷來未嘗躬逢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風箏或蜻蜓罷了。

有一種自稱『中國文藝年鑑社』而實是匿名者們所編的中國文藝年鑑在牠的所謂『鳥瞰』中，曾經說我所發表的連環圖畫辯護雖將連環圖畫的藝術價值告訴了蘇汶先生，但『無意中卻把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爲一般大衆所理解，即是否還成其爲大衆藝術的問題忽略了過去，而且這種解答是對大衆化的正題沒有直接意義的。』這真是倘不是能編中國文藝年鑑的選家，就不至于說出口來的聰明話，因爲我本也『不』在討論將『德國板畫搬到中國來，是否爲一般大衆所理解』所辯護的只是連環圖畫可以成爲藝術，使青年藝術學徒不被曲說所迷，敢于創作，並且逐漸產生大衆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編者所希望，『有意的』來說德國板畫是否就是中國的大衆藝術，這可至少也得歸入『低能』一類裏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問：『要是德國板畫那類藝術作品搬到中國來，是否能爲一般大衆所理解』呢？那麼，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未來派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該能够理解一點。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國文藝年鑑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

少。風俗習慣，彼此不同，有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但這是人物，這是屋宇，這是樹木，卻能够懂得，到過上海的，也就懂得畫裏的電燈，電車，工廠。尤其合式的是所畫的是故事，易于講通，易于記得。古之雅人，曾謂婦人俗子，看畫必問這是什麼故事，大可笑。中國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說不出他以為好的畫的內容來，俗人卻非問內容不可。從這一點看，連環圖畫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連環圖畫辯護中，已經證明了牠是藝術，傷害了雅人的高起了。

然而，雖然只對於智識者，我以為介紹了麥綏萊勒的作品也還是不夠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無字的，總得翻印好幾種，纔可以窺見現代外國連環圖畫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畫，也較易近真，有益于觀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國的青年藝術學徒了，學外國文學可看原書，學西洋畫卻總看不到原畫。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將一大幅壁畫縮成明信片那麼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關係的，假使我們將象縮小如豬，老虎縮小如鼠，怎麼還會令人覺得原先那種氣魄呢。木刻卻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來，還不至于大相遠。

但這還僅就介紹給一般智識者的讀者層而言，倘爲藝術學徒設想，鋅板的翻印也還不够。太細的線，鋅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線，也能因強水浸蝕的久暫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細，中國還很少製板適得其宜的名工。要認真，就只好來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圖』二百五十本，在中國便是首先的試驗。施蟄存先生在大晚報附刊的火炬上說：『說不定他是像魯迅先生印珂羅版本木刻圖一樣的是私人精印本，屬於罕見書之列，』就是在譏笑這一件事。我還親自聽到過一位青年在這『罕見書』邊說，寫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騙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報少，不過想擡高那書價。

他們自己沒有做過『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這些笑罵是都無足怪的。我只因爲想供給藝術學徒以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畫來製玻璃版，但製這版，是每製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須另製，假如每製一幅則只印一張或多至三百張，製印費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張即需六元，九百張九元，外加紙張費。倘在大書局，大官廳，即使印一萬二千本原也容易辦，然而我不過一個『私人』並非繁銷書，而竟來『精印』，那當然不免爲財力所限，只好單印一板了。但幸而還好，印本已經將完，可知還有人看見；至于

爲一般的讀者，則早已用鋅板複製，插在譯本士敏土裏面了，然而編輯兼批評家卻不屑道。

人不嚴肅起來，連指導青年也可以當作開玩笑，但僅印十來幅圖，認真地想過幾回的人卻也有的，不過自己不多說。我這回寫了出來，是在向青年藝術學徒說明珂羅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製板上普通的事，並非故意要造『罕見書』，並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爲不負責任的話所欺，大家都來製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木刻創作法』序

地不問東西，凡木刻的圖版，向來是畫管畫，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國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經衰退；清光緒中，英人傅蘭雅氏編印格致彙編，插圖就已非中國刻工所能刻，精細的必需由英國運了圖版來。那就是所謂『木口木刻』也。即『複製木刻』和用在編給印度人讀的英文書，後來也就移給中國人讀的英文書上的插畫，是同類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兒童，見了這些圖，便震驚于牠的精工活潑，當作寶貝看。到近幾年，才知道西洋還有一種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叫作『創作木刻』，是藝術家直接的創作，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現在我們所要介紹的，便是這一種。

爲什麼要介紹呢？據我個人的私見，第一是因爲好玩。說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經，

但我們鈔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會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掛在牆壁上的畫，那豈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畫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無須乎此的，否則，一張什麼複製縮小的東西，實在遠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費。自然，也許有人要指爲『要以「今雅」立國』的，但比起『古雅』來，不是已有『古』『今』之別了麼？

第二，是因爲簡便。現在的金價很貴了，一個青年藝術學徒想畫一幅畫，畫布顏料，就得化一大批錢；畫成了，倘使沒法展覽，就只好請自己看。木刻是無需多化錢的，只用幾把刀在木頭上劃來劃去——這也許未免說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樣，可以成爲創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創作的歡喜。印了出來，就能將同樣的作品，分給別人，使許多人一樣的受到創作的歡喜。總之，是比別種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遠了。

第三，是因爲有用。這和『好玩』似乎有些衝突，但其實也不盡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麼。打馬將恐怕是終於沒有出息的了；用火藥做花砲玩，推廣起來卻可以造鎗砲。大廠，總算是實用不過的罷，而安特萊夫一有錢，卻將牠裝在自己的庭園裏當玩藝。木刻原是小富家兒藝術，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裝飾，文學或科學書的插畫上，也就成了大家的東

西，是用不着多說的。

這實在是正合于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

但是至今沒有一本講說木刻的書，這還是第一本。雖然稍簡略，卻已經給了讀者一個大意。由此發展下去，路是廣大得很。題材會豐富起來的，技藝也會精鍊起來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的路徑來的希望。那時作者各將自己的本領和心得，貢獻出來，中國的木刻界就會發生光燄。這書雖然因此要成爲不過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歷史上的意義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魯迅記。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癡』，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癡』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教徒弟時，卻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爲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祕方，做廚子的有祕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祕傳，爲了保全自家的衣

食，聽說這還只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裏去。『祕』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祕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卻好像偏偏並無祕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麼『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名稱，彷彿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麼祕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係，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麼，作文真就毫無祕訣麼？卻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祕訣，是要通篇都有來歷，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麼；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于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于修辭，也有一點祕訣：一要蒙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牠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着爾雅文選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

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爲『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爲『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着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鼉聲，餘分閏位』，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楊雄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云：『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爲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裏，以嗅花香，他嫂嫂爲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楊班並無不合的，錯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裏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麼？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

乎勇，』掩了醜，也就彷彿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髮，中年婦人罩上面紗，就都是蒙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着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藉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輓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牠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牠『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喫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喫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裏，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着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的可貴。譬如到什麼廟裏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到廟裏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擡到的廟，即使

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裏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纔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里，成了所講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秘訣了。但我想，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麼大兩樣，因為牠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卻並沒有秘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

搗鬼心傳

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愛看古樹發光比大麥開花的多，其實大麥開花他向來也沒有看見過。於是怪胎畸形，就成爲報章的好資料，替代了生物學的常識的位置了。最近在廣告上所見的，有像所謂兩頭蛇似的兩頭四手的胎兒，還有從小肚上生出一隻腳來的三腳漢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領是有限，他無論怎麼怪，怎麼畸，總有一個限制：孿兒可以連背，連腹，連臀，連脅，或竟駢頭，卻不會將頭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駢拇，枝指，缺肢，多乳，卻不會兩腳之外添出一隻腳來，好像『買兩送一』的買賣。天實在不及人之能搗鬼。

但是，人的搗鬼，雖勝于天，而實際上本領也有限。因爲搗鬼精義，在切忌發揮，亦卽必

須含蓄。蓋一加發揮，能使所搗之鬼分明，同時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遠，而影響卻又因而模糊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謂『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筆記裏，常說羅兩峯的鬼趣圖，真寫得鬼氣拂拂；後來那圖由文明書局印出來了，卻不過一個奇瘦，一個矮胖，一個臃腫的模樣，並不見得怎樣的出奇，還不如只看筆記有趣。小說上的描摹鬼相，雖然竭力，也都不足以驚人，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晉人所記的臉無五官，渾淪如雞蛋的山中厲鬼。因為五官不過是五官，縱使苦心經營，要牠兇惡，總也逃不出五官的範圍，現在使牠渾淪得莫名其妙，讀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糊。不過較之寫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聰明得遠。

中華民國人的宣布罪狀大抵是十條，然而結果大抵是無效。古來儘多壞人，十條不過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動是決不會的。駱賓王作討武曌檄，那『入宮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這幾句，恐怕是很費點心機的了，但相傳武后看到這里，不過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麼樣呢？聲罪致討的明文，那力量往往遠不如交頭

接耳的密語，因爲一是分明，一是莫測的。我想假使當時駱賓王站在大衆之前，只是攢眉搖頭，連稱『壞極壞極』，卻不說出其所謂壞的實例，恐怕那效力會在文章之上的罷。『狂飈文豪』高長虹攻擊我時，說道劣迹多端，倘一發表，便即身敗名裂，而終于並不發表，是深得搗鬼正脈的；但也竟無大效者，則與廣泛俱來的『模胡』之弊爲之也。

明白了這兩例，便知道治國平天下之法，在告訴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實的說出何法來。因爲一說出，卽有言，一有言，便可與行相對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測。不測的威稜使人萎傷，不測的妙法使人希望——饑荒時生病，打仗時做詩，雖若與治國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卻能令人疑爲跟着自有治國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卻還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謂妙法，其實不過是毫無方法而已。

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家庭爲中國之基本

中國的自己能釀酒，比自己來種鴉片早，但我們現在只聽說許多人躺着吞雲吐霧，卻很少見有人像外國水兵似的滿街發酒瘋。唐、宋的踢球，久已失傳，一般的娛樂是躲在家裏徹夜叉麻雀。從這兩點看起來，我們在從露天下漸漸的躲進家裏去，是無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嘗慨乎言之，曾出一聯，索人屬對道：『三鳥害人鴉雀鴿』，『鴿』是彩票，雅號獎券，那時卻稱爲『白鴿票』的。但我不知道後來有人對出了沒有。

不過我們也並非滿足于現狀，是身處斗室之中，神馳宇宙之外，抽鴉片者享樂着幻境，又麻雀者心儀于好牌。簷下放下起爆竹，是在將月亮從天狗嘴裏救出；劍仙坐在書齋裏，啾的一聲，一道白光，千萬里外的敵人可被殺掉了，不過飛劍還是回家，鑽進原先的鼻孔。

去，因為下次還要。這叫做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所以學校是從家庭裏拉出子弟來，教成社會人才的地方，而一鬧到不可開交的時候，還是『交家長嚴加管束』云。

『骨肉歸于土，命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一個人變了鬼，該可以隨便一點了罷，而活人仍要燒一所紙房子，請他住進去，關氣的還有打牌桌，鴉片盤。成仙，這變化是很大的，但是劉太太偏捨不得老家，定要運動到『拔宅飛昇』，連雞犬都帶了上去，而後已，好依然的管家務，飼狗，餵雞。

我們的古今人，對於現狀，實在也願意有變化，承認其變化的，變鬼無法，成仙更佳，然而對於老家，卻總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藥只做爆竹，指南針只看墳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現在是火藥蛻化為轟炸彈，燒夷彈，裝在飛機上面了，我們卻只能坐在家裏等他落下來。自然，坐飛機的人是頗有了的，但他那里是遠征呢，他為的是可以快點回到家裏去。家是我們的生處，也是我們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總退卻」序

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爲「閒書」，這在五十年前爲止，是大概真實的，整日價辛苦做活的人，就沒有工夫看小說。所以凡看小說的，他就得有餘暇，既有餘暇，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有閒，卽是有錢！」者以此。誠然，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在現制度之下，「閒暇」恐怕也確是一種「富」。但是，窮人們也愛小說，他們不識字，就到茶館裏去聽「說書」，百來回的大部書，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聽下去。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他們也還是較有閒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館，那有閒錢做茶錢呢？

小說之在歐美，先前又何嘗不這樣。後來生活艱難起來了，爲了維持，就缺少餘暇，不

再能那麼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破費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這一種洋文壇上的趨勢，也跟着古人之所謂『歐風美雨』衝進中國來，所以『文學革命』以後，所產生的小說，幾乎以短篇爲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構成鉅製，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古之小說，主角是勇將策士，俠盜賊官，妖怪神仙，佳才子，後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五四』以後的短篇裏卻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因爲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歐風美雨』中的飄搖的，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氣。現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飄搖，不再要聽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他們要知道，感覺得更廣大，更深邃了。

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顯示着分明的蛻變，人物並非英雄，風光也不旖旎，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我以爲作者的寫工廠，不及她的寫農村，但也許因爲我先前較熟于農村，否則，是作者較熟于農村的緣故罷。

序「卻退總」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魯訊記。

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文化列車破格的開到我的書桌上，是十二月十日開車的第三期，託福使我知道，近來有這樣一種雜誌，並且使我看見了楊邨人先生給我的公開信，還要求着答覆。對於這一種公開信，本沒有一定給以答覆的必要的，因為牠既是公開，那目的其實是在給大家看，對我個人倒還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過目的也還是在給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給個人就完了麼？因為這緣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應該先將原信重抄在下面——

魯迅先生：

讀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筆名）的

『讀偽自由書』一文，近末一段說：

『讀着魯迅：偽自由書，便想到魯迅先生的人。那天，見魯迅先生吃飯，咀嚼時牽動着肌肉，連胸肋骨也拉拉動的，魯迅先生是老了！我當時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記得從前看到父親的老態時有過這樣的情緒，現在看了魯迅先生的老態又重溫了一次。這都是使司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況旁邊早變心了魏延。』（這末一句照原文十個字抄，一字無錯，確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兩個感想：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一個是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爲什麼是諸葛亮先生的『旁邊』那裏來的『早變心了魏延？』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

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記得『吶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時候，（大概總在十年前，）我拜讀之後，景仰不置，曾爲文介紹頌揚，揭登于張東蓀先生編的『學燈』。在當時我的敬愛先生甚于敬愛創造社四君子。其後一九二八年『語絲』上先生爲文

譏誚我們，雖然兩方論戰絕無感情，可是論戰是一回事，私心敬愛依然如昔。一九三〇年秋先生五十壽辰的慶祝會上，我是參加慶祝的一個，而且很親切地和先生一起談天，私心很覺榮幸。左聯有一次大會在一個日本同志家裏開着，我又和先生見面，十分快樂。可是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消息』都登載着先生要『噓』我的消息，說是書名定爲『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了『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裏頭只說先生出陣交戰用的是大刀一詞加以反攻的諷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緒與態度都是敬愛先生的。文中的意義卻是以爲先生對我加以『噓』的襲擊未免看錯了敵人吧了。到了拜讀大著『兩地書』以後爲文介紹，筆下也十分恭敬并沒半點謾罵的字句，可是先生於『我的種痘』一文裏頭卻有所誤會似地順筆對我放了兩三枝冷箭兒，特別地說是有人攻擊先生的老，在我呢，並沒有覺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

章也沒有攻擊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認爲是老了吧了。伯納蕭的年紀比先生還大，伯納蕭的鬢毛比先生還白如絲吧，伯納蕭且不是老了，先生怎麼這樣就以爲老了呢？我是從來沒感覺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覺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讀了李儻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驚訝，原來先生真的老了。李儻先生因爲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頭』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態的時候，有過的情緒，我雖然也時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親，但並沒有如人家攻擊我那樣地想做一個『孝子』，不過是天性所在有時未免興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儻先生的文章並沒有聯想到我的父親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與驚訝。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爲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來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第二個感想使我……因爲那是李儻先生的事，這裏不願有擾清聽。

假如這信是先生覺得有答覆的價值的話，就請寄到這裏文化列車的編者將牠發表，否則希望先生爲文給我一個嚴正的批判也可以。發表的地方我想隨處都歡迎的。

專此并竭誠地恭敬地問了一聲安好并祝

康健。

楊邨人謹啓。

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帶聲明一句，我作這信是出諸至誠，并非因爲鬼兒子罵我和先生打筆墨官司變成小鬼以後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爲是信的形式，所以開頭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給我的信是沒有答覆的價值的。我並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無須我批

判，因為近二年來的文字，已經將自己的形像畫得十分明白了。自然，我決不會相信『鬼兒子』們的胡說，但我也相信先生。

這並非說先生的話是一樣的叭兒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為永久誠實的罷，不過因為急促的變化，苦心的躲閃，弄得左支右絀，不能自圓其說，終於變成廢話了，所以在聽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實是不必寫的。

先生首先問我『爲什麼是諸葛亮？』這就問得稀奇。李儵先生我曾經見過面，並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無從確說，因為又燃先生我是沒有豫先見過的。我『爲什麼是諸葛亮』呢？別人的議論，我不能，也不必代爲答覆，要不然，我得整天的作答案了。也有人說我是『人羣的蝨賊』的『爲什麼？』——我都由牠去。但據我所知道，魏延變心，是在諸葛亮死後，我還活着，諸葛亮的頭銜是不能加到我這里來的，所以『無產階級大衆何時變成了阿斗？』的問題也就落了空。那些廢話，如果還記得三國志演義或吳稚暉先生的話，是不至于說出來的，書本子上及別人，並未說過人民是阿斗。現在請放

心罷。但先生站在『小資產階級文學革命』的旗下，還是什麼『無產階級大眾』自己的眼睛看見了這些字，不覺得可羞或可笑麼？不要再提這些字，怎麼樣呢？

其次是先生『驚心動魄』于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後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豫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牠還年青，牠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

于是就要說到『三嘯』問題了。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聞上所載的有些兩樣。那時是在一個飯店裏，大家閒談，談到有幾個人的文章，我確曾說：這些都只要以一嘯了之，不值得反駁。這幾個人們中，先生也在內。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裏，明白的告白了農民的純厚，小資產階級的智識者的動搖和自私，卻又要來豎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過也並未說出，走散了就算完結了。但不知道

是輾轉傳開去的呢，還是當時就有新聞記者在座，不久就張大其辭的在報上登了出來，並請讀者猜測。近五六年來，關於我的記載多極了，無論爲毀爲譽，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爲我沒有聘定律師，常登廣告的鉅款，也沒有徧看各種刊物的工夫。況且新聞記者爲要哄動讀者，會弄些誇張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還全盤捏造。例如先生還在做『革命文學家』的時候，用了『小記者』的筆名，在一種報上說我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週年，不料引起了郁達夫先生對於亡兒的記憶，悲哀了起來。這真說得栩栩如生，連出世不過一年的嬰兒，也和我一同被噴滿了血汗。然而這事實的全出于創作，我知道，達夫先生知道，記者兼作者的您楊邨人先生當然也不會不知道的。

當時我一聲不響。爲什麼呢？革命者爲達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話，我是以爲不錯的，所以即使因爲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着牙關忍受。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裏，自己舔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傅藥。但是，人非聖人，爲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誚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在三

閒集中，一點也不刪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麼？不但此也，在講演裏，我有時也會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笑的權利的。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麼『良心』或『無產階級大眾』之名，來凌壓敵手，我接着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先生，這還不够退讓麼？

但爲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裏，還賞我拿一柄大刀。在禮儀上，我是應該致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並無大刀，只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這也並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我確曾用這筆碰着了先生，不過也只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並不特別含有報復的惡意。但先生卻又給我掛上『三枝冷箭』了。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只是陳源教授的餘唾。然而，即使算是在報復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于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裏面去。

至于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並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將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爲『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爲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於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麼壞。我以爲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並不是奸商。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讚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爲『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爲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爲『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

來，爲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懺悔，對於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僱員的看不起小錢店伙計是一樣的。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益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只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別；文章也隨處能够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和閩人驍將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爲先生並不是奸商的緣故。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爲我的『將因爲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爲幸。

專此奉答，並請

信開公生先人邨楊答

著
安。

魯
迅。

一九三三，一二，二八。